

编委会

主任：王保旺
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春萍 王运生 王晓蒙
孙建设 何成洲 李福仁
于向东 张新华 李兴根
孟新生 范士富 郑莉芳
侯怀青 胡新科 朱继山
主编：张新华
副主编：孙建设
编 务：毕 阳

主 办：中共新乡市委党史研究室
新乡市中共党史学会
编辑出版：《新乡党史》编辑部
发送范围：省主管部门、市四大班子
领导、各县（市、区）、
市直各单位、驻新高校、
各乡镇、街道办事处、省
辖市党史研究室

地 址：新乡市人民东路甲 1 号
中共新乡市委党史研究室
邮 编：453003
电 话：0373-3696300
电子信箱：zgxx3696@163.com
准印证号：河南省连续性内部资料
〔新乡〕0028 号
印 刷：新乡市商务快印有限公司

新乡党史

存史 资政 育人



XINXIANG CHINA

目 录

2015年第4期(总第78期)

纪 事



07

毛主席接见豫北地区负责同志 / 郭九龄

◆领导讲话

- 04 在市委中心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第三次学习研讨时的讲话
/ 舒 庆
-

◆牧野撷史

- 12 百泉乡师的抗日救亡活动
/ 李守成
- 15 新乡县抗日民主政府
/ 张献高

◆新乡·故事

- 22 回忆新乡市大办钢铁运动
/ 李文生
-

◆卫水巨澜

- 25 抗日英雄郟国武
/ 刘春龙

◆理论园地

27 论辉县抗日战争中人民群众之力量

/ 张 宇

◆党史人物

32 政治交通员郭美

/ 孙建设

◆论 坛

35 怎样做一名合格的党史工作者

/ 孙建设

◆大事记

39 中共新乡历史大事记（7-10月份）

封面：1958年10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专列
接见新乡地委领导人和10位县委书记。

封底：① 1959年，新乡市各界群众8万余人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
② 1968年新乡各界群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周年
③ 1969年新乡各界群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
④ 1970年新乡各界群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

在市委中心组“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第三次学习研讨时的讲话

中共新乡市委书记 舒庆
(2015年11月10日)

聚焦严以用权，深化思想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我们要深刻认识严以用权的重要意义，始终保持头脑清醒，正确对待，规范用权。严以用权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内在要求。我们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担负着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执政使命。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权力来自人民，权力属于人民，只有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才能使权力造福社会、造福人民。能否严以用权，直接关系到我们党执政基础的稳固，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的成败。严以用权是领导干部为官从政应当恪守的底线。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手中有权、肩上有责。能否严以用权，是对每一位领导干部最经常、最现实的考验，也是衡量领导干部是否称职、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严以用权就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滥用权力就会损害群众利益，败坏社会风气。领导干部不论在什么岗位，

都要敬畏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守牢严以用权的底线。严以用权是检验党员干部践行“三严三实”的重要标尺。严以用权是“三严三实”的重要内容，也是践行“三严三实”的核心所在。对广大党员干部来说，用权是一面镜子，修身律己通过用权来体现；用权是一种手段，干事创业通过用权来实现；用权是一方试金石，做人作为官通过用权来检验。我们要把严以用权作为践行“三严三实”的重中之重，时时铭记、事事坚持、处处上心，在严以用权中谋事创业做人，树立起忠诚、干净、担当的新形象。

坚持反求诸己，深刻查摆问题

从我市“三查三保”活动和巡视巡察情况看，从基层干部群众反映的问题看，我市在严以用权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一是偏离宗旨，与民争利。有的领导干部宗旨意识、公仆意识淡化，看问题、办事情、作决策，从群众的角度考虑问题少，没有把解决群众关注的实际问题贯穿始终，一些决策群众不理解，甚至出现了与民争利、侵害群众利益的现象。比如，有些基层干部利用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搞暗箱操作，截留、挪用、侵占涉农、扶贫等补助款；有的挪用低保、福利等民生资金；有的套取医保和新农合基金，

等等。二是心怀贪念，以权谋私。有的领导干部身居重要岗位，将公权异化为牟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发生了严重违纪问题；有些重要领域、关键岗位干部利用职权搞权力寻租，违规为他人在职务晋升、业务合作、工程建设等方面谋取利益；有的部门变换名目隐匿列支公款吃喝和接待费用，挥霍浪费财政资金，等等。三是无视法纪，任性妄为。有的干部置市委三令五申于不顾，仍然我行我素，公车私用、午间饮酒，影响极坏；有的单位“一把手”独断专行，违规决策，搞“一言堂”“一支笔”；有的有章不循、有规不依，甚至突破政策红线办事，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四是懒政怠政，为官不为。随着作风建设、廉政建设的深入推进，一些干部片面认为“为官不易”，不敢用权、不敢担当，出现了为官不为现象。有的责任心不强，办事效率不高，拖拖拉拉，疲疲踏踏，甚至推诿扯皮。有的对工作盯得不紧、抓得不牢，好项目、大项目引不进来，企业项目审批手续长时间批不下来，等等，影响了经济社会发展。

我们要按照省委“就实求实、反求诸己”的要求，从这些问题向上反推，认真反省，从自身做起，从具体问题抓起，严格整改落实，决不能放任这些问题影响党群、干群关系，损害党和政府形象，贻误改革发展良机。

把握实践要求，做好表率示范

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牢记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的责任，履职尽责，勤政廉政，争做忠诚、干净、担当的表率。

一要牢记宗旨，为民用权不忘本。要恪守为民之责。牢固树立“权由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权力观，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要深怀爱民之心。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真心关心群众疾苦，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群众满意与否作为衡量权力行使的重要标准，真正做到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要多办利民之事。经常到条件艰苦、矛盾集中、困难突出的地方去，察民情、知民需、解民忧，着力解决好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卫生、扶贫帮困等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持续做好每年向群众承诺的民生实事，以实际行动回应群众关切。

二要清正廉洁，秉公用权不谋私。要分清公私界限。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时刻牢记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乱用，不因私利抛公义，不因私谊废公事，始终做到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要经常自警自醒。对手中的权力怀有敬畏之心，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严格落实中央、省、市有关规定，对全局性、政策性问题和“三重一大”等事项由党委（党组）集体讨论决定，不搞大权独揽、独断专行。要勇于接受监督。深刻认识到“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监督是有效的防火墙”，自觉接受来自上级、同级与下级的监督、党内与党外的监督、组织与群众的监督、社会与媒体的监督，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三要严守法纪，依法用权不任性。权力是有边界的，把权力的边界冲开，就是滥用权力。要守牢法纪红线。时刻牢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心中高悬法纪明镜，手中紧握法纪戒尺，自觉把用权行为严格约束在法纪之内。要筑牢法治观念。做决策、办事情多想一想是否合法、是否逾矩，多想一想法律的依据、法定的程序、违法的后果，不断提高解读法律、把握法律，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促进发展的能力。要

扎牢制度“篱笆”。以探索推进“4+4+2”党建制度体系为契机,加快推进党风政风监督检查、权力规范运行等廉政制度建设,完善述职述廉、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用制度管人、管事、管权。

四要担当尽责,勤政务实不懈怠。要务实谋事。善谋者胜,远谋者兴。作决策、谋发展是领导干部的重要职责,也是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前提。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既符合客观规律又结合新乡实际,既统筹兼顾又突出重点,不脱离实际,不好高骛远。当前,要认真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结合我市实际,进一步编制完善全市“十三五”规划纲要,为明年工作和“十三五”发展起好步、开好局奠定坚实基础。要踏实创业。强化“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意识,在其位谋其政,行其权担其责。尤其是新常态下,对广大干部干事创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注重加强对政策法规的学习研究,做到吃透精神、结合实际、融会贯通、敢于创新,做到既讲规矩又敢担当,既干事创业、推动工作,又把握原则、不越底线。对市委、市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要沉下心、俯下身,以钉钉子精神,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件接着一件干,积小胜为大胜。要老实做人。对党要忠诚,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把对党的信仰深入骨髓、融入血脉,始终做到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对事业要精诚,在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奋斗上,舍得下苦功夫、舍得下实功夫,舍得下笨功夫,锲而不舍,精益求精。对同志要真诚,做到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谅解,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着力营造团结协作、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我市“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启动以来,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中央、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把开展专题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认真安排部署,从严从实要求,精心组织实施,坚持与中心工作融合协调推进,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下一步,要再接再厉、持续用力,以更认真的态度、更有

力的举措推动专题教育取得更大实效。一要扎实做好“规定动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省委书记郭庚茂在省委中心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第三次学习研讨时的总结讲话精神,按照立根固本、落细落小、修枝剪叶、从谏如流的要求,从严从实推动专题教育开展。市委常委要带头抓好对联系点的指导,通过听取汇报、列席会议、明察暗访等方式,层层传导压力和责任,促使各级各部门把每个活动环节都抓实在、抓到位。市委进行学习研讨后,其他市级领导班子、各县级党委(党组),要按照上级要求,认真开展好第三次专题研讨。二要着重抓好整改落实。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坚持问题导向,认真梳理查摆,对班子、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刻剖析、认真整改,为下一步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做好准备。要建好问题、责任、整改“三个清单”,做到整改目标、内容、标准、时限四明确,对照清单督促检查,跟踪问效,逐项落实。要着眼于推动践行“三严三实”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抓好我市“4+4+2”党建制度体系深入实施和巩固提升。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组织县级党委着力排查基层干部不作为、乱作为、贪腐谋私、执法不公等问题,开展重点整治,切实维护群众利益。三要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当前距年底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各项工作都已进入决战决胜状态,能否向全市人民交出一个好的成绩单,是对我们践行“三严三实”成效的重要检验。要把深化“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与“三查三保”活动紧密结合,与稳增长、保态势紧密结合,与全面深化改革紧密结合,与安全生产、维护稳定、环境保护、改善民生、文明城市创建、基层党建等重点工作紧密结合,相互衔接,相互促进,尽心尽责,狠抓落实,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1958年，毛主席在专列上接见新乡地区领导干部

毛主席接见豫北地区负责同志

□ 郭九龄

1958年10月31日，豫北大地上出现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当夜幕降临时，一列草绿色列车从北京方向开来，在开道车的引导下，于黄河北岸新乡车站停下，列车上乘坐的不是别人，而是毛泽东主席和他的战友们。在郑州会议前夕，毛泽东赴郑途中停留新乡车站的。

列车刚一停下，毛主席便在他的专列办公室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接见了豫北地区部分地、市、县的领导同志。当时，我在《豫北日报》工作，有幸成为被接见的几十位同志之一，这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田家英出主意，一张大字报留住了毛泽东

新乡地区，于1956年实现了高级合作化后，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根据形势的需要，报经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于1958年3月，将豫北原有的新乡、安阳两地区合并，成立了新乡地委和专署，统辖新乡、安阳、鹤壁、焦作四市和24个县，是河南省较大的地区。合并后很快出现了“大跃进”的高潮。新乡县七里营区的几十个高级合作社，于7月下旬，成立了一个叫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的组织，8月6日，毛主席视察了七里营，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号召，随后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全区便实现了公社化。伴随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兴起，也出现了严重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说假话的浮夸风，生产上不切实际的瞎指挥和干部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及特殊化等错误，严重影响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党中央、毛主席为纠正这一“左”的倾向，决定在郑州召开工作会议。

会议前夕，中共河南省委通知新乡地委：毛主席由京赴郑途中，在新乡车站停留，预计10月31日晚到达新乡。要求地委负责同志作好向主席汇报工作的准备，并由地委负责通知先期到七里营作调查研究工作的主席办公室主任田家英一并来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10月31日下午，地委召开了各部办负责同志和县委书记紧急会议，对毛主席到来后的工作做了具体安排，要求遵守纪律，对会议内容绝对保密。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于晚7点也赶到新乡，专程迎接毛主席。

晚7时30分，先是一列铁道车开进车站，然后，毛主席的专列迎着夜幕徐徐进站了。当主席的专列停稳之后，省委史向生书记、新乡地委耿起昌书记、李炳源专员，在田家英主任带领下，登上专列。耿起昌书记简要地向主席汇报了新乡地区大跃进和农业合作化的情况，尤其新乡地区出现了一个一县一社的情况。毛主席颇有兴趣地问：“是哪个县？谁当书记？谁当社长？”耿起昌说：“修武县，是个小县，15万人口，原县委书记任公社书记，原县长任公社社长。”毛主席听了，哈哈地笑了。耿起昌乘机汇报说：“主席，我们正在召开扩大会议，各市县的书记听说主席途经这里，他们也都来到车站恭候，想得到主席的接见。”主席笑了笑说：“先让那个一县一社的书记来谈谈。”于是，修武县委书记张洋芹同志登上专列，向毛主席汇报工作。

正在这时，传来一个与众多同志愿望相反的消息：陪同主席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和铁道部长滕代远考虑到主席沿途多次召开各地区负责同志座谈会，惟恐累坏主席身体，加上天气转寒，又是黑夜，下车接见惟恐有失，想让主席尽快离开新乡到郑州休息。听到这个消息，等候在车站的我们心情非常焦急。情急之下，大家恳求田家英出主意，于是田给大家出了个留住主席的好主意：让七里营的同志以人民公社的名义，写张大字报，希望向主席汇报工作。此计

果然很灵，主席一听说有大字报，决定列车停下，召开座谈会，看看大字报。田家英向地委传达了主席的意见：为便于谈话和讨论问题，座谈会规模不宜过大，以10人为宜。会议结束之后，主席再下车，接见参加地委扩大会议的同志，顿时，等候在车站上的地、市、县委负责同志沸腾了。

参加主席座谈会的人员是：地委书记耿起昌、专署专员李炳源、副书记刘东升、新乡市委书记张苏斌、封丘县委书记韩鸿绪、延津县委书记苗润生、温县县委书记李树林、济源县委书记侯树堂、修武县委书记张洋芹、安阳县委书记陈春雨10位同志。接着，这些同志在耿起昌引导下，登上主席的专列办公室。



主席点燃一支香烟，说：“大家随便谈”

主席来到办公室后，同参加会议的同志一一握手，当大家就座后，主席点燃了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环视了一周，亲切地说：“今天，把各位父母官请来，想听听你们那里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情况，大家有什么说什么，随便谈。”

10月31日晚七点半在主席专列办公室召开10人座谈会时，我在车下等候主席接见，此后在我采访耿起昌书记时，他说：“主席最关心和询问最多的问题是大办钢铁、农业生产、群众生活问题，主要是食堂吃饭和大跃进中的劳逸结合问题，强调科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力戒浮夸等问题。”

出席座谈会的同志，多是第一次见到主席，心情十分兴奋，一时不知从哪里说起，谁也不先开口。这时，七里营人民公社的大字报送到主席手里，主席接过大字报，稍看了一下，笑嘻嘻地问：“是谁写的大字报？”耿起昌回答说：“是主席视察过的七里营人民公社，请主席去

看看他们的丰收情况。”主席笑着幽默地说：“唔，你们写我的大字报，要我去，若不去，就是官僚主义喽！史向生作证。”接着开会。

当主席问到封丘县委书记韩鸿绪时，耿起昌马上插话作介绍说：“他是封丘县委书记，是应举公社那篇文章《一个苦战两年改变面貌的合作社》的作者。”毛主席高兴地说：“唔，你立了大功，办好一个合作社，也是不容易的事啊！”接着，耿起昌书记汇报了全区大办钢铁的情况。主席问：“分给你们的钢铁任务是多少吨？有多少人参加？已经炼了多少吨？”耿起昌说：“省委分配我区炼钢5万吨，炼铁50万吨的任务，我们采取‘土法上马’用‘小、土、群’的方法，不久就会过渡到‘大洋群’的方法。到目前，已完成17万吨。11月份，还要创出持续高产的奇迹来。”毛主席听后，郑重地问：“（土法上马）你们炼出来的是铁水还是渣渣？”耿起昌说：“炼出来的有铁水，也有渣渣。”主席又问：“给你们分配调铁任务了没有？都是哪里来调铁的？”耿起昌说：“炼出来调给北京、天津、上海。”毛主席问：“完成任务了没有？”耿起昌说：“还没有调。”主席又问：“如果任务完不成，你们准备怎么办？”在坐同志异口同声地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完成任务。”毛主席听了以后，说：“同志，你们革命革的很彻底哟，把群众的锅都革掉了，叫群众家里

冒冒烟，也是可以的嘛！目前，这是一股风，这股风，恐怕是七八级或已到十级喽。要压缩一下，要降降温，要去掉虚报浮夸，有些指标高，没有措施不好。”“你们有多少人上山办钢铁？”耿起昌说：“到目前为止，已有五六十万人上山了。”毛主席说：“你们的本事不小啊！能动员五六十万人上山，等于一个淮海战役喽，在山上吃住怎么办？死人了没有？”耿起昌回答说：“吃饭是大食堂，住的是窝棚，还没有发现死人。”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吃住要搞好哇，每人每天，要保证吃1斤半粮食，3钱盐，5钱油，还要有蔬菜，住宿要能遮风避雨。以后天气冷了，要动员部分人畜下山，搞不好要死人的哟！”

当有的同志汇报说“工地上，群众情绪很高，干劲很大，苦干、实干、拼命干，连觉都不愿意睡”时，毛主席马上问：“你们这里有没有连轴转？”耿答：“也有，不普遍。”毛主席又说：“同志，不行呀，连轴转，会转死人的呀！要有劳有逸才行。你们的脑子热的很。不睡觉怎么行！要下命令，让群众睡觉，这是一件大事。你们对群众睡觉要研究，比如，做活紧张时，要不要让群众就地睡半个小时？每天，成年人睡8个小时，睡7个小时就没有完成任务；活稍松时，睡7个小时，在工地还要让群众睡1个小时，这要当成任务，要‘强迫命令’。吃饭、睡觉，两件大事，有劳有逸，劳逸结合，效率才能高。我说这些，你们赞成不赞成？”耿起昌说：“过去秋收种麦这段再实行。”毛主席听了，不太满意地说：“怎么过去这段再实行？现在就要实行。要研究个‘睡觉宪法’。成年人要睡8个小时，青年人要睡10个小时，睡少了不行，睡少了，现在受损失，将来也受损失，这个‘强迫命令’老百姓欢迎。要强迫干部执行，你们干活有没有连长？”大家回答：“有。”主席说：“连长指挥，就在当地睡觉，你们都要当成大事研究，



1958年10月31日，毛主席在专列上接见新乡地区领导

这才叫优越性。听田家英说，七里营的社员摘棉花，上午效率比下午高，就是中午没有休息好。”



毛泽东：“哎哟，为什么都把锅砸了呢！”

当耿起昌汇报到办食堂的问题时，毛主席关切地说：“你们说办好食堂是件大事，是啊，群众，一是要吃饭，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好，吃上热饭；二是要睡好，不睡也不行。你们这里群众一个月吃多少斤粮食？”耿起昌回答说：“每人每月吃50斤粮食。”毛主席又问：“有没有菜？吃多少盐？多少油？群众还可种些油料，棉籽油也可以吃，一定要让群众吃饱，一个礼拜能不能吃回肉？这些事都要管啊！”耿起昌汇报说：“食堂除每人每月50斤粮食外，还有蔬菜。”当提及对“五种人”还有照顾时，主席问：“哪五种人？”“就是老人、小孩、病号、产妇、客人。”主席又问：“怎么照顾呢？”耿起昌说：“老人住幸福院，小孩进托儿所、幼儿园，病人派人伺候。”主席又问：“你们的幸福院幸福不幸福啊？老人都愿意去吗？在幸福院让老人做活不做？”史向生书记插话说：“家有人照顾的老人不愿意去幸福院，无人照顾的老人才去幸福院。有的老人闲不住，也自动做点活。”主席说：“管饭吃的人要注意哟，过去我们不当保姆，如今办了食堂、幸福院、托儿所、幼儿园，大人小孩都得管，管就要管好，食堂要比在家吃的好一点，大锅饭要比小锅饭好才行，不办好食堂干什么？办好才显出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啊！所以，要把食堂办好。”

毛泽东主席停了片刻没再发问，他深深地吸了口烟，环视了一下，语重心长地说：“我在想，食堂会不会垮？有没有垮台的食堂？食堂究竟怎么样？”在场人说：“食堂垮不了。”“现

在没有垮的食堂。”主席问：“食堂要不要饭票？”大家回答：“不要饭票。”主席又问：“为什么食堂垮不了？”“大办钢铁把锅都砸了。”毛泽东听了说：“哎哟，为什么都砸了呢？让群众家里冒冒烟也是可以的呀。”

当修武县县委书记张洋芹站到毛主席面前，毛主席说：“你是那个修武县？一县一社？”张洋芹说：“是修武县，是个小县，15万人，我们是一县一社，这里既有全民所有制，又有集体所有制，这该怎么进行分配呢？”毛主席说：“嗯，参加会议的十几个人，只有你提到了分配问题，这个问题提得好，应该很好研究，要实行按劳取酬，供给制加工资制，还要发点奖励工资。”

毛主席问：“你们这里，社员发不发工资？”刘东升回答说：“有60%的社员能发上工资。”毛主席说：“这就是说，有40%的社员发不上工资，那么，60%的社员工资人民币从哪里来？”刘东升回答说：“社员们卖棉花、卖粮食换来人民币。”毛主席又问：“谁买你的棉花和粮食？你们修武工资发多少？”张洋芹说：“没有发。”毛主席摇了摇头说：“不发点工资，不好吧。人民公社，最少也要发几毛钱的工资，或几块，几十块，你们这里的分配水平怎样？”耿起昌说：“平均分配每人在70元左右。”毛主席说：“人民公社还是实行按劳取酬，实行供给制加工资制好，而且还要发点奖励工资，不发工资，怎么体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呢？”当毛主席从名单上看到济源县委书记侯树堂时，主席深情的说：“济源有个王屋山，是愚公移山的地方。”侯树堂马上站起来说：“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把济源县建设好。”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搞农业生产……搞不好也会死人的。”

点到安阳县委书记陈春雨时，主席说：“啊，



1958年10月31日，毛主席接见新乡地区领导

你是安阳的，安阳是曹操起家的地方，曹操这个人，懂得用人之道，他招贤纳士，不搞宗派，搞‘五湖四海’，还注意疏浚河道，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啊！”陈春雨向主席汇报：宋朝时，安阳水冶、铜冶就有炼铁业，从考古出土的“坩锅”和石门楣上刻制着赵匡胤名字证实，赵匡胤在那里炼过铁。主席说：“赵匡胤祖籍河北涿州，后唐天成二年生于洛阳夹马营，祖父当过涿州、冀州刺史，他父亲是后唐、后晋的点禁军，赵匡胤年轻时漫游到湖北襄阳等地，至于是否在安阳炼过铁，就不知道了。”

在谈到农业问题时，耿书记将地委副书记刘东升介绍给了主席，主席握着刘东升的手问：“你现在抓什么工作？”刘东升回答说：“地委分工，我抓农业，眼下主要是小麦播种。”主席又问：“种小麦搞不搞密植？一亩地下多少种子？”刘东升说：“我们搞了密植，一般每亩二三十斤，多者播种120斤。”主席问：“下这么多种子，能出来吗？”刘东升说：“种得早的已经出来了。”主席又说：“太密了，出来也会挤死，种地不能蛮干，要讲科学。你们这里土地深耕吗？”刘东升回报说：“深耕，种麦时，一般耕五六寸，七八寸，深耕的地方翻一二尺深不等。”主席说：“麦子种以后，

冬季管理要注意，要追上肥料，种地嘛，要深耕细作，作到少种多收，用深耕细作的方法达到少种多收的目的，改过去浅耕粗作广种薄收，深耕要分层施肥，你们有这个经验没有，你们区有多大面积？这要慢慢来，不要马上把大田毁掉，搞试验田，真正的深翻，不只是七八寸，而是一二尺，深耕加机械化，不然要累死人的哟！今后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提高农业产量，每亩地先搞1000斤，然后搞到2500斤就好了，你们要研究这个问题，几年十几年，逐步过渡。”主席加重语气说，现在

在搞农业生产，是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作战，虽然比打日本、打蒋介石好些，可是，搞不好也会死人的。所以，要讲科学，不能盲目干，也不要蛮干，比如，深耕耕多深好，密植下多少种子好？都要研究，先搞“试验田”，逐渐摸索总结经验，然后才能推广。

夜，静悄悄的。站在毛主席专列下边等候的人越聚越多，主席来新乡的消息本来是保密的，谁知人们是怎么知道的呢？这时，车站上的人，估计要有一二百的样子，已是夜晚10点半了。

主席的座谈会接近尾声，已是晚上11点，主席问：“你们这里还在搞‘连轴转’？同志，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那会转死人的哟！种地要讲科学，不是说过嘛，实干精神与科学态度结合嘛，有人就是不结合，不行啊！”说罢，主席看了一下表，从座位上站起来，对大家说：“会议开了两个多小时喽，到此结束。”

经过短暂的休息，毛主席又接见参加地委扩大会议的地、市、县委领导同志，我也荣幸地亲聆其教诲。直到11月1日零时30分，主席的专列才离开新乡车站。（文章图片均摘自2004年第3期《纵横》杂志）

百泉乡师的抗日救亡活动

□ 李守成



乡师抗日救亡活动的蓬勃兴起

百泉乡师即河南省立百泉乡村师范学校，1931年1月建于辉县百泉的苏门山下。此后不久，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很快席卷了大江南北，辉县城乡也到处燃烧着抗日的烈火。乡师广大师生积极参加了这一抗日救亡活动。

日军的暴行，民族的危急，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引起了乡师广大进步师生的极大愤慨和忧虑。他们立即行动起来，罢课罢教，走向县城，游行示威。师生们沿途书写标语，张贴漫画，散发传单，高呼“誓雪国耻”“抵制日货”“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吸引了许多群众，扩大了宣传效果。他们根据辉县当时7个区的建制，将师生划分为7个宣传组，分赴城镇、乡村开展抗日“宣传周”活动。师生们走村串户或站立街头，面对父老乡亲，悲愤激昂，声泪俱下，痛述“九·一八”事变的真象，无情揭露日军占领沈阳的罪行，号召同胞们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为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生存而斗争。进步师生的宣

传活动，唤醒了广大民众，推动了全县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乡师抗日救亡活动的中流砥柱

乡师抗日救亡活动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救亡活动在校内外的蓬勃兴起，逐渐引起了学校当局的警觉。他们勾结国民党辉县反动政府，加紧了对进步师生的监视和镇压。乡师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爱国运动逐渐趋向低潮，一些进步团体解散，一些进步刊物被扼杀。而“新垦文艺社”却迎着这股逆流不屈地诞生了，成了乡师抗日救亡活动的中流砥柱。

新垦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为挽救民族危亡、洗雪国耻而奋起战斗的一个青年文艺团体。1935年10月，进步学生赵文渊、乔景楼、傅尚普（傅东岱）、王福义（王苏林）、吕和竹（吕英）等人发起和组织了新垦文艺社，将20多名不同年级的同学团结起来，共同探讨革命理论，传播进步思想，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新垦社在名义上是文艺团体，但实际上是团结进步师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战斗集体。

新垦社成立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百泉乡师的进步师生也积极投入了这一爱国壮举。他们发动全体学生，实行全校总罢课，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开展宣传。刚刚建立的新垦社，虽缺乏斗争经验，但也异常活跃。他们不仅积极发动学生罢课游行，而且还主动参与组织游行队伍到国民党辉县政府示威请愿，要求当局惩办镇压学生运动的凶手，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使全国上下形成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其势如燎原之火，愈燃愈烈。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此极为恐慌，三令五申要求各地采取措施，对进步活动和爱国分子实行严厉制裁，全国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许多抗日志士、爱国师生惨遭迫害。在乡师，学校反动当局更是有恃无恐，对进步师生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学校反动当局以诱骗手段在学生中网罗了一批打手，充当其监视、打击、迫害进步师生的工具。在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中，乡师的抗日救亡活动再度出现低潮。但广大进步师生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特别是新垦社社员，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改变斗争策略，运用公开的或隐蔽的、合法的或非合法的形式，继续发动广大师生，与反动势力进行斗争，推动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

在举行第四届学生毕业典礼前，贾五印作为毕业生代表，准备在会上向学校当局提出在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建议，校方却威胁不准他讲。新垦社闻讯后，主要负责人赵文渊、乔景楼亲自去做他的工作，鼓励贾不要惧怕校方的反动淫威，不要辜负同学的殷切期望。在毕业典礼会上，贾五印大胆发表在校内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等建议，受到进步师生的热烈欢迎，搞得校方狼狈不堪。新垦社还通过组织读书会、座谈会、时事辩论会、演讲会、教唱救亡歌曲、表演抗日活剧，与进步教师建立经常性的联系等多种形式，宣传团结抗日，激发师生的爱国

热情。

作为文艺团体，新垦社还充分发挥文艺的宣传鼓动作用，创办刊物，开辟专栏，宣传抗日。1938年，新垦社先后在郑州《大华晨报》和漯河《警钟日报》上，分别开辟了《新垦》、《向实》专栏，在省城开封出版了《海星》月刊。《海星》的创刊，对唤起河南民众，奋起参加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海星》出版不久，就遭到河南反动当局的“围剿”——先是不予登记，继之严令取缔。面对恶势力的挑战，新垦社成员毫不畏惧，与之展开了机智灵活的斗争。他们边申请登记，边出版刊物。尽管《海星》月刊最终未获反动当局批准，并被严令取缔，但该刊已面向社会发行了两期。



乡师抗日救亡活动的再度高涨

新垦社不畏强暴、英勇斗争的精神，影响和带动了广大师生。一些往日埋头读书，不问国事的学生也认识到国难当头，自己有责，开始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表现了较高的爱国热情。他们纷纷建立起各种群众性的进步团体，广泛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读书会、时事辩论会、学生救国会、各种书社以及后来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等等。他们通过读书研究、时事辩论、开办书店、墙报漫画、集会演讲、歌咏活动等多种形式，传播进步思想，开展抗日宣传。

读书会乡师数量较多、影响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一种进步学生组织。有的是公开的，有的是秘密的；有的是本班级的，有的是跨年级的。尽管读书会在形式上多种多样，但实质上都是青年师生传阅进步书刊、学习革命理论、探讨研究问题的组织，也是他们与反动当局斗争的一种组织形式。当时在学生中影响较大的

书刊主要有《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 ABC》、《青年自学丛书》、《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和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作品。有的还阅读了马列的一些经典著作，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等等。通过读书学习，乡师的许多师生进一步接受了革命理论，更自觉地投身于火热的抗日救亡活动之中。进步学生董移山，利用到乡师附属实验小学实习的机会，秘密物色进步青年，通过介绍进步书刊、讨论座谈、解疑释难、秘密会议等形式，向

他们传播进步思想，宣传抗日救亡。这些学生毕业后，董移山又介绍其中的积极分子王永等人到开封、洛阳、广州寻找进步人士，参加救亡组织。

进步师生不顾当局的恫吓和镇压，除了利用教学实习和节假日深入周围的教育实验区和其它乡村宣传抗日救亡外，还充分利用每年一度的百泉药材交流大会，积极开展救亡宣传活动。他们利用乡师依山傍湖，位于大会中心的有利条件，建宣讲棚，设医疗站，创办《百泉日报》。在向与会群众宣讲农业科技知识、破除封建迷信的同时，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抵制日货、团结御侮的革命道理，深受群众的欢迎。在进步师生的宣传鼓动下，许多群众和客商增强了民族自尊心，积极主动地协助他们查禁日货，开展救亡宣传，但国民党辉县地方当局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乘大会之机巧立名目，敲诈客商，中饱私囊，而且还对进步群众的抗日言论和行为横加限制和干涉。在 1937 年的药材交流大会上，新垦社成员、二年级学生丁茂才不惧反动当局的淫威，毅然起草传单，带头抨击当局的无耻行径，并联络同学抄写散发。丁茂才的正义举动，得到了广大进步师生的响



百泉乡师

应和支持。他们纷纷走出学校，在大会上四处张贴标语、漫画，开展街头演讲，历数辉县反动政府的累累罪行，阐明宣传救亡有理，抵制日货无罪，号召商民们团结起来，勇敢地同邪恶势力作斗争。进步学生的革命行动，击中了当局的要害，呼出了商民的心声，受到了群众的欢迎，但却惹恼了辉县反动当局。县长耿彩章亲自带着警察来学校“搜查共产党”。当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师生的强烈义愤。在新垦社的带动和影响下，全校学生集体罢课，前往辉县政府示威抗议。耿慑于学生和社会的压力，深恐事态继续扩大，被迫亲自到校向全体学生公开赔礼道歉。

乡师抗日救亡活动的再度高涨，有力地促进了广大师生和民众的觉醒，推动了校内外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乡师的许多进步师生，尤其是新垦社成员，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先后积极投入到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中。他们奔赴延安和其它抗日根据地，或深入乡村发动群众，坚持抗战。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许多人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其中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道路。

新乡县抗日民主政府

□ 张献高

1943年，解放区军民经过反“清乡”、“反扫荡”、反“蚕食”的斗争，收复了大片土地，逐步渡过了严重的困难局面。7月27日，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发出《关于开辟豫北工作的指示》，指出：“把豫北创造成为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豫北党当前的基本任务”；要求在开辟豫北工作时，要充分发动群众，加强对敌斗争，从对敌斗争中创立与巩固根据地。1944年5月22日，太行军区发出《关于开展豫北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指示》。太行军区七分区部队在司令员皮定钧率领下，6月3日攻克了敌占辉县薄壁镇及庙岗，歼日伪军50余人，打开了辉西的局面；7日攻打日伪据点张村，歼日伪军百余人，拔掉了插在辉（县）、汲（县）、新（乡）三县间的这根毒钉。在取得这些胜利之后，中共太行七地委书记高扬派汪洋下山，到新、辉、汲三角地带建立新乡县抗日民主政府。

建立抗日政权

1944年10月20日前后，汪洋（原名王敬贤，辉县北陈马人，原在辉县抗日政府任民政科长）奉命带着警卫员李春堂下山来到杨闫川郭坡村郭儒家（郭儒原是汪洋的老师），叫他连夜赶写新乡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的布告。天快亮时，100多伪军正在附近柴庄抢劫。汪洋与警卫员赶到柴庄村头，向伪军扔了一颗手榴弹，炸死了两个伪兵。接着，他们一边打枪一边向村里冲。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吓懵了，丢下抢劫的几

十头牲口及大批粮食等仓皇逃窜。他们在追击敌人时又打死两个伪兵，获枪两支。

早饭后，汪洋在柴庄召集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宣布八路军为救国救民，在麦窑村建立新乡县抗日民主政府，号召大家积极支援。随后，汪洋等向附近各村张贴了60多张新乡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的布告，也贴到了敌人经常出没的边远村庄。敌人很快得知了消息，再也不敢轻易往杨闫川一带扰乱了。

开辟根据地

位于新（乡）辉（县）汲（县）三县交界的杨闫川一带，曾为日伪长期占领，土匪恶霸横行无忌，群众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镇压地方上的土匪恶霸，便成了新乡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的首要任务。

李金盘是杨闫川一带有名的顽匪，在新乡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前是日伪张村据点联庄会头目，与日伪勾结甚密，拥有几十条长短枪，并雇有多名保镖，纠结地痞流氓横行乡里，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他弟兄四人，三个都“血债累累，十恶不赦”。1943年春，李氏三兄弟曾勾结日伪打死八路军游击战士数人。新乡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他们仍负隅顽抗，暗中破坏民主政权。县武工队将其弟兄三人抓获，召集群众大会，让群众诉苦伸冤，并当即将其兄弟三人枪决。从此杨闫川一带的恶霸地主及其他不法分子再也不敢与民主政权对抗了，受

苦群众更积极拥护和支持抗日政府，打开了抗日新局面。到1945年元月，全县共建立4个区，辖75个村庄。一区张村，二区后沟，三区冯窑，四区分将池。

在建立区级政权的同时，新乡县抗日民主政府根据太行七军分区“整理与建设人民武装——编制自卫队，发展和整理民兵”的指示，在根据地政权较为巩固的地方，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了村政权及农会、民兵、自卫队、儿童团、妇救会等群团组织。仅1945年上半年就发展农会会员380名，民兵230人。

发展地方武装开展军事斗争

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与壮大，新乡县地方武装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1945年初，县大队已经发展到80余人，4个区的武工队也相继建立，少则10几人，多则几十人。七八月间，新乡县独立营建立，县长汪洋兼营长，副营长刘明德，政委王云清，副政委乔国全。这时独立营有1000人左右，新购置枪支190多条。还建立了170多人的公安队，队长王金书。4个区的武工队也发展到130多人。

新乡县地方武装，为保卫和巩固根据地，同日伪军开展游击战，还配合太行军区部队主动向日伪进攻。

1945年春天，日伪军已经不敢单独到解放区根据地“扫荡”了。一次，盘踞在新（乡）、辉（县）、汲（县）三县的伪军联合向杨闫川一带进攻。三路伪军汇合于杨闫川南的申屯，正在村里大肆抢劫，被县独立营和武工队发现。三区武工队在余踊带领下，从东连岩直逼敌人；县独立营从北面压顶而来。战士们同仇敌忾，杀声震天。伪军乱作一团，扔下抢劫的资财分头逃窜。在汪洋亲自指挥下，县独立营乘胜追击，直把逃往辉县方向的伪军追到沿村；这时敌人还未及喘气，县独立营李至智、李春堂带领另一部分战士又把敌人从沿村赶至常村北地，打得逃敌一路上丢盔抛甲。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

件投降，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广大军民。新乡全县武装一齐向敌占村庄出击，所到之处，召集群众大会，大讲日本投降、八路军胜利的消息。原被敌军占领的潞王坟、老道井等10余村青壮年组织自卫队，拿起武器参军参战。17日，新乡县独立营与数百民兵组成一个大队，配合太行七分区主力攻打辉县城，于19日攻克县城，又随大军直逼新乡城郊，攻克三鲁堡等伪据点。

正当全国军民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欢呼的时候，蒋介石密谋发动内战。9月12日，新乡被国民党军占领，10月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率部从新乡沿平汉路北犯。新乡县抗日民主政府立即组织民兵、群众四五百人，一夜之间将新乡以北的平汉铁路扒了很长一段，并烧掉了潞王坟敌碉堡，推迟了马、高部队北犯的时间。

新乡县县大队（独立营）在打击最顽固最反动的日伪同时，还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分化瓦解敌人。1945年春天，他们利用土匪八支队和日、伪军之间的矛盾，积极争取该支队共同抗日。当时八支队拥有三四千人，经过谈判，他们表示：不到解放区骚扰，遇到八路军游击部队不开枪。后来还有七八十个士兵跑到八路军部队来了。

有名的“山彪镇起义”是瓦解敌军的又一胜利。牛子龙原是郟县西部拥有几千人的一支杂牌军头目，牛自任司令。1945年9月初，牛部在豫南准备投奔新四军途中，于临颖被正向北进的高树勋部收编。编后成为国民党冀察战区挺进第九纵队，牛任纵队参谋长。不久，他发现高处处歧视他。9月20日高部驻进新乡后，牛部驻扎城北山彪镇。这时牛就主动派人与八路军联系，新乡县抗日民主政府以及当时在太行七专署新乡办事处任主任的张天性等从中周旋，牛于10月12日黎明率部300多人起义，部队拉到抗日根据地杨闫川。经过整训，牛部被改编为“民主建国军豫北支队”，牛子龙任

支队司令员。牛子龙部官兵后来在《新华日报》（太行版）上通电“呼吁和平，反对内战”，高树勋起义后，致电高树勋总司令，对其“高举义旗”感到“兴奋”，并请高随时指教。

军民齐出动灭蝗保秋粮

继1942年至1944年连续三年的旱、蝗灾害，1945年5月以后，新乡县抗日根据地又发生了严重的蝗虫灾害。据载：“一脚下去，就踏死几十个”，“一手能捉住十几个”，“一方步有3斤重”，可见蝗灾之甚。

根据太行七地委“一手坚持对敌斗争，一手发动群众消灭蝗虫”的指示，新乡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了“剿蝗指挥部”，负责领导全县的灭蝗斗争。全县组织了一支几千人的灭蝗大军，由“指挥部”统一调动，哪里虫多就往哪里打。群众在灭蝗斗争实践中，创造了各种灭蝗经验。如对蝗蛹采取土围歼灭战（即在蝗蛹集中地四周挖沟，把蝗蛹赶入沟内用土掩埋而灭之），对飞蝗则用火攻战（即在夜间点火引蝗扑火自焚）；还总结了长蛇阵（人们排成长队，边赶边打）、葫芦阵（象葫芦一样包围一圈打之）等战术。1945年8月17日《新华日报》（太行版）推广了新乡县郭坡村“摸住剿蝗规律打得多”的5条灭蝗经验。

反奸清算减租减息

抗战胜利后，在新解放区开展反奸反霸和减租减息运动是太行区斗争的主要任务之一。

1945年9月，太行七地委办公室以《新乡敌特警队的活动与阴谋》为题发出通报，揭露敌人从伪军抽调一批汉奸进行特务训练后，潜入太行区根据地，有的甚至打入革命队伍内部进行破坏活动。关于新乡县的反奸清算运动政策，七专署副专员李毅之1945年8月28日在给汪洋县长的信中明确指出：锄奸运动，掌握宽大政策的基本精神，清查并登记逃回之伪军，让其坦白悔过，为害较甚者，应通过群众斗争方式让其向群众提出悔过自新、不危害群众之保证；适当退出其过去所抢劫之赃物，归还被

害主。派人清查由城市逃来或匿藏之大汉奸，依法惩处。

新乡县抗日民主政府从1945年9月开始，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奸清算运动，太行七地委派李友久具体领导新乡县的这一斗争。运动一开始，全县县、区两级干部集中办训练班，学习有关反奸清算政策，武装思想，然后分头下去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斗争。运动中，对有嫌疑的日伪人员，反复交待党的政策，其中犯罪较轻，态度又好者，只要向人民低头认罪，并肯退出抢劫掠夺之财物，予以从宽处理；对个别罪大恶极，态度又不老实的分子，通过召开群众大会，揭发批判，诉苦斗争，并绳之以法。仅一区在斗争中就镇压伪奸细人员18名。如原张村村长，土匪出身，干过伪保长，奸淫妇女，欺压群众，无恶不作，光人命就有几条，民愤极大。八路军占领张村据点后，他受辉县日伪派遣，潜伏下来，伪装积极，当了张村的村长。他在村里对群众大耍淫威，群众敢怒而不敢言，致使该村的工作局面一直打不开。在反奸清算运动中，通过深入群众，调查访问，查准了他的罪恶事实，发动群众进行斗争，并将其镇压，群众大快。后来换上民兵积极分子张克瑶当村长，张村的面貌焕然一新。

在反奸清算斗争开展的同时，新乡县抗日民主政府根据上级有关指示，积极进行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全县的减租减息实行两种办法：老区如道士坟、滑峪、郭坡、大小王庄等实行四六减，即一石租子减免四斗，其他新区实行三七减。

此外，新乡县抗日民主政府还采取了按人口收入多少实行“累进计分负担”的办法。由于灾情，减少公粮征收数量，富户出，贫户免，大大减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

1945年12月，太行五专署决定：“为便利工作，将原新乡一区、二区、三区与辉县城关区、高庄区合并统一领导，定名为辉县”，新乡县抗日民主政府遂告结束。



□ 岳超然

一

1944年6月，在抗日战争开始局部反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强调开展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对于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意义，指示各局各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指示要求“应该以每一个城市（大的、中等的和小的），每一段铁路公路，每一个伪军部队与伪警组织为工作对象，都组织一个有能力的工作委员会去进行工作”。

太行区党委接到中央指示后，连续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本区敌占城市工作，抓紧抽调、动员、训练干部，组建城市工作领导机关，并决定在太原、石门（石家庄）、新乡三个重要基点建立城市工作委员会。

新乡是豫北重镇，南临黄河天堑，北依太行屏障，平汉、道清两条铁路交会于此，战略

位置十分重要。1938年2月沦陷后，日军在新乡屯集大量兵力和物资，把新乡作为进攻太行、冀鲁豫根据地的军事基地。1941年4月，原中共新辉获汲中心县委副书记陈济民被捕叛变，新乡党组织遭到破坏，城里和近郊党的工作形成空白。1943年8月，八路军发起林南战役，解放了太行山南部大片地区，并继续将根据地和游击区向南推进，这在新乡敌占区重新开辟党的地下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1944年冬，太行区党委选调干部，在辉县宝泉村正式组建中共新乡城市工作委员会。为了隐蔽的需要，对外称“新乡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新乡救联会”（抗战胜利后，仍沿用“救联会”）。

二

中共新乡城工委成立时，委员有杨珏、米光华、杨真（张杨真）。杨珏任书记，米光华

任副书记，杨真兼任秘书。政治交通员为郭美、李毅（女）。机关还配两名通讯员，1名炊事员。

1944年底至1945年初，区党委调卞诚（未到职）、张天性、李自如任城工委委员。1945年4月区党委调钟施恩任城工委委员。5月，钟施恩被派遣入城，在近郊黄岗以摆烟摊和跑行商作掩护，代表城工委领导城内的地下斗争。

1945年春，张天性被派往辉县杨闫川和新乡县潞王坟一带活动，成立太行七专署新乡办事处，张任主任，对外称新乡县抗日政府县长。李自如被派往汲县塔岗，成立汲县办事处，李任主任，主要负责汲县华新纱厂工运。1947年4月，张天性正式被任命为新乡县民主政府县长，离开了城工委。同年9月，李自如及其领导的办事处转归太行五地委，李自如也不再担任城工委委员。

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区党委调罗红任城工委委员，负责组织和派遣工作。2月，区党委调张苏斌任城工委委员，同年6月调离。1947年2月，区党委又调王锡璋、张亚夫任城工委委员。王锡璋调入后，负责宣传、统战和青运工作。同年4月，张亚夫被调任新乡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杨真被调任新乡县委副书记、县公安局长，二人均离开了城工委。

1947年4月，区党委调戴云程任城工委委员，负责职工运动，同年11月调离。1948年6月，区党委调张高峰任城工委委员，同年8月调离。

1947年5月，米光华被调往太行区党校学习，后另分配工作。7月，杨珏任太行五地委副书记，王锡璋接任城工委书记职务。

为了工作的配合和协调，新乡城工委成立后，区党委决定杨珏还担任太行七地委（后为五地委）委员兼地委城工部长。地委确定杨珏代表地委领导辉嘉和新乡县的工作。1947年4月，王锡璋、罗红兼任新乡县委副书记。1948年2月，按照晋冀鲁豫中央局社会部指示，新乡城工委、太行军区九兵站、晋冀鲁豫军区豫北兵站，联合成立对敌斗争工作委员会，王锡璋任负责

人。

新乡城工委设有处理行政事务的秘书，始由杨真兼任，后由赵维德、冯靖、杨轲（女）、蔡康志（女）、阎英相继担任。1947年后，机关勤杂人员有：事务长、会计、炊事员、饲养员等各1名，警卫通讯班和几个办事员。



时任新乡城工委书记
杨珏

抗战胜利后，城工委在辉县薄壁还开办“同义号”商店，由许铭朝、许铭勋、赵建永等负责。

新乡城工委派遣打入到城里和近郊的干部，抗战时期有张凤彬、钟施恩、席永洲、杨璞，抗战胜利后有杨一虹。所有派遣打入的干部都必须使用化名，一律采取单线联系，不许发生横的关系。城工委定期通知他们回机关学习，汇报工作。往返路线、联络地点和暗号，均由城工委规定，并派人接送。

新乡城工委隶属太行区党委城工部领导，1947年9月后，区党委委托太行五地委代管，但城工委的人事和经费仍由区党委负责。

新乡城工委机关一直设在根据地内，开始在辉嘉县境内，后在新乡县境内。随着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城工委机关渐次向新乡推移。开始在宝泉等山区，后迁到山下薄壁一带。计驻过的村镇有：宝泉、薄壁、杏树庄、马武庄、王庄、焦泉营、小孟淹、马营、南樊村、和庄、陈位庄、楼村。1948年底迁至距新乡20公里的新乡县小冀镇。

三

新乡城工委通过派遣打入工作，在城里和近郊共建立了5个地下基层支部。

铁路支部

1944年底，新乡城工委派张凤彬（原太行五专署公安处干部）由交通员郭美护送入城。张先在亚云轩的佛堂（西华堂）内隐蔽，并取得户籍，后在郭美的安排下，顶王耀先的名字，在车站机务段当了铁路工人。张凤彬团结联系铁路工人，开展工作，1945年初经城工委批准，发展了王金青、王振范、司光华等入党，建立了中共铁路支部，张凤彬任书记。该支部开始与郭美联系，5月后，受城工委委员、派遣干部钟施恩（尹友兰）单线领导。

该支部至新乡解放前夕，共有15名党员，全系铁路工人。党员有：张凤彬、王金青、王振范、司光华、傅梦祥、李永禄、罗广昌、杜绍明、张文良、贾万太、杜万勤（另有4名党员姓名不详）。

姜庄支部（亦称街道支部）

1945年春，城工委派遣原在汲县根据地工作的席永洲（化名宋明礼），由刘玉德护送入城。席永洲以刘玉德表弟身份，在一横街取得了户籍，以做泥瓦工（间做小商贩）为掩护，联系团结姜庄、石榴园一带的市民群众，开展工作。5月，经城工委批准发展了宋得才、刘玉德、王汉生、宋青梅（女）入党，建立了党小组，刘玉德任组长。

1946年2月，经城工委批准建立姜庄支部，



时任新乡城工委副书记
米光华

刘玉德任书记。至解放前夕，该支部共有8名党员，全系泥瓦工、木工和商贩。党员有：刘玉德、宋得才、王汉生、宋青梅（女）、岳绍金、赵坤、于清河、张志明。该支部归席永洲领导，1946年12月郭美牺牲后，宋青

梅（女）任支部交通员。

1948年秋至1949年初，席永洲在近郊唐庄以“保书记”身份作掩护，开展工作，先后发展了杨明（住城里姜庄）、陶五祥、陶五太、陶五中、陶五合、陶清沂等6人入党，全系铁路工人。根据城工委指示，不再建立支部，党员归席永洲单线领导。

鲁堡支部

杨璞系城北郊南鲁堡人，1938年2月参加平汉抗日游击支队，6月加入共产党，后在根据地林县工作。1943年春，被豫北地委派回原籍“埋伏”，开展工作。新乡城工委成立后，关系转归城工委。

杨璞在南鲁堡先后发展了杨宗兰、杨玉福、杨玉章、杨宗太、杨宗海等入党。1944年底至1945年初，建立两个党小组。1947年4月，经城工委批准，建立中共鲁堡支部，杨宗兰任书记。该支部归杨璞领导，至解放前夕共有10名党员，全系贫苦农民。党员有：杨宗兰、杨玉福、杨玉章、杨宗太、杨宗海、杨玉厚、杨宗春、杨玉富、杨玉庆、戚久兰。

地下党员周玉芝系冀鲁豫军区敌工部门情报人员，在原籍鲁堡“埋伏”。后经批准与杨璞接上关系，归其领导，单独活动。地下党员杨政，属城工委隐蔽干部，归杨璞领导。周玉芝、杨政两人均未编入支部。

杨璞、杨政和鲁堡支部的杨玉章、杨玉富、杨宗春、戚久兰等，打入到国民党陈堡镇公所，杨政任镇公所自卫大队附兼集训中队长，杨璞任直属分队队长，其他4名党员任直属分队班长和机枪射手，控制了镇公所地方武装。

济农铁工厂支部

李春泰是日营兴亚铁工厂工人，1945年3月在新乡城工委机关加入共产党。返城后继续在兴亚铁工厂开展工作，并发展了杨连顺入党。抗战胜利后，李春泰和杨连顺到济农铁工厂当工人。1947年10月，发展了王金峰入党，经城工委批准，建立了济农铁工厂支部，李春泰

任书记。支部共有3名党员，全系产业工人。该支部受钟施恩领导。

1948年初，济农铁工厂倒闭，党员与积极分子分散隐蔽。4月，牛村支部遭到破坏，因李春泰与牛村支部个别人有联系，城工委指示：“李春泰领导之支部应该解散，重新调整，李不可领导其他原有党员，而单独存在于伪延津县政府修械厂（注：厂址在臧营）。”

牛村支部

城西北近郊的牛村、冀场、黄岗3村，距飞机场较近。新乡城工委为了掌握敌飞机场和乡镇的情况，建立工作基地，1946年初，派遣原在根据地林县县委工作的杨一虹（化名王贵德），由地下党员李春青（1946年初在城工委机关入党，家住牛村）护送到牛村。杨一虹以林县“逃亡地主”身份作掩护，取得了牛村小学教员职业，在牛村、冀场、黄岗开展工作，发展党员。1947年7月，经城工委批准，建立牛村支部，杨一虹任书记。该支部共有7名党员，多为贫苦农民。党员有：杨一虹、李春青、武连云、武瑞云、阎保全、孟宪富、赵来桐。交通员为赵来桐（辉县人，在黄岗住，以卖菜为生）。

牛村支部直接归杨一虹领导，同时城工委还决定，该支部受城工委委员钟施恩政治领导，即牛村支部开展重大政治斗争时，必须请示钟施恩，然后再报告城工委。钟施恩与杨一虹不直接见面，必要时由秘密联络点联系转达。牛村支部遭破坏时，城工委及时通知在黄岗“埋伏”的钟施恩转移到远处。

牛村支部发动群众，通过合法选举，李春青担任了大保长，控制了“保”政权。支部还派地下党员阎保全打入到敌飞机场，开展工作，搞到一批弹药。

1948年4月，牛村支部交通员赵来桐回城工委机关汇报请示工作，返回途中，在辉县被县保安队抓去当壮丁。杨一虹得讯后，未经城工委通知，擅自回机关。杨一虹途经辉县南云门村，被县保安队逮捕，未经严刑，即向敌人

自首。辉县保安队立即通告新乡国民党军警，迅速到牛村、冀场、黄岗进行大搜捕。该支部除李春青机智脱险外，其余党员全部被捕，还有一批进步群众也遭捕入狱，牛村支部遭到破坏。5月，辉县保安队将杨一虹、赵来桐押送新乡，后新乡国民党第十二绥区公署将杨一虹等6人押解郑州，投入狱中。10月，郑州解放，才获释回到城工委机关。1949年8月，经中共中央华北局批准，开除杨一虹出党。

另外，出于地下工作的需要，钟施恩在开封、郑州、漯河等地，发展一批“关系”。张振生（代号小葫芦）在许昌、漯河、郑州等地，也建立了一批“关系”。1947年11月，张振生随戴云程调离城工委，张振生所建“关系”也随之脱离新乡城工委。以上各地“关系”，均未批准入党。新乡城工委在新乡的国民党河南第四行政专署、县政府、乡镇、社团组织、银行、工厂、学校等，也建立了一批工作“关系”。

1948年11月，太行区党委从区党委机关、四地委、五地委抽调干部，在新乡县小冀镇组建了中共新乡市委和新乡市人民政府。李伟任市委书记，李毅之兼任市长。城工委书记王锡璋任副市长，城工委委员罗红任市委组织部。1949年1月，城工委委员钟施恩任市职工会主任，城工委秘书蔡康志任市委妇委副书记，杨璞任市委青委副书记。城工委其他人员均到市委工作。2月，城工委奉区党委指示，正式并入市委。城工委所领导的各地下支部和其他派遣隐蔽干部，转归市委领导。

至此，中共新乡城工委完成了历史使命。此后，城工委成员及各地下支部，在市委的领导下，再接再厉，继续进行迎接新乡解放的斗争。

回忆新乡市大办钢铁运动

□ 李文生

大跃进中我曾在市委钢铁办公室工作过。新乡市大办钢铁运动，当时在豫北四市以至全省都是有名气的，有它光辉的一面。但是，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到1962年关停下马的大办钢铁运动，由于违背客观规律，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和损失，问题严重，教训深刻。

1958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以后，全国为1070万吨钢而奋斗。实际上新乡市从7月份就开始大炼钢铁了。7月下旬市委召开钢铁工作会议，确定到年底生产钢4万吨、铁2万吨、钢材2万吨的任务。方针是全党动员，全民动手，自力更生，因陋就简，以小型、土法为主，土洋结合，大中小结合。

最初全市各行各业都炼铁，采用山西民间冶炼办法，工艺简单，收集废铁，放到粘土制成的高温锅里烧化，炼成熟铁。用这种办法炼铁，远不能完成省下达的钢铁任务，只有用铁矿石冶炼才能多出铁。紧接着成立了豫北四市一地钢铁协作区，物资互通有无，共同开发铁矿资源。新乡没有铁矿，就和焦作市协商，在修武九里山划一块地方给新乡。那里虽然不成矿床，是鸡窝矿，开采起来很不经济，但是总算有铁矿了，就建了一个一两千人的采钢厂，调新乡采石厂的李永祥去当厂长。

炼铁经历了由小土炉到小高炉的过程。小土炉简陋，在地上挖个坑，把土垛起来，围成炉的形状，叫做瓶式大肚土炉。冶炼也简单，把矿石和煤混到一起，让它自己燃烧，就是炼铁了。因为温度不够，只是把煤和矿石熔成一体，叫做烧结铁。这种铁根本不能用，白白浪费。逐渐用小高炉（又叫小洋炉）取代小土炉，比较正规一点了。小高炉用钢板焊接，内衬耐火砖，容积有1.5立方米、5立方米、13立方米、20立方米、28立方米各种规格，烧焦炭，用鼓风机增加炉内温度，炼出来的铁质量比较高，一般都可以用。

钢铁指标经常变化，随着形势的发展，参考各地放卫星的情况，不断修订指标，指标越来越高。1958年10月，市委为完成省下达月产1500吨铁、1万吨钢（从外地调生铁炼钢）、4000吨钢材的任务，号召全市大造小土炉，放钢铁卫星。提出的口号是“学信阳，赶信阳，日产百吨铁、千吨钢”，“人人建炉，个个炼钢”。在卫河以北，铁路以西的大片地方，小土炉星罗棋布，炼钢铁的队伍川流不息，黑烟滚滚，人喊马叫，形成一个很壮观的钢铁战场。

钢铁元帅升帐，以钢为纲推动全面工作大跃进，基建、机械、电力、燃料、运输都要保

证钢铁生产。工厂、机关、学校各行各业都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大搞协作，支援钢铁生产。需要人抽人，需要物资调物资，不能打折扣。为了加强钢铁战线的领导，成立了市委钢铁办公室（设在计委），市委常委、工业部长赵守仁任主任，市委副秘书长苏凯、市计委副主任李文生任副主任，下设生产指挥处、材料供应处、交通运输处，负责钢铁战线全面协调工作。所需干部由市委工业部负责调配。专门成立冶金局作为主管部门。市委分管工业的书记罗毅直接抓钢铁。

1958年10月，贯彻钢铁基地化、生产工厂化的方针，市委根据钢铁生产已有的基础，



1958年土法上马，自炼钢铁

决定把分散的炼铁单位集中起来，建两个钢厂。先在潞王坟建立新乡第一钢铁厂。开始只有1座13立方米的小高炉，到1960年建成投产5座13立方米小高炉，还有炼钢转炉和轧钢机，可以出钢锭，生产多品种钢材。1958年12月，市委又决定把通丰面粉厂、新华区和商业局办的3个钢铁厂合并，成立新乡第二钢铁厂，以原通丰钢铁厂的厂址为基地，就是北干道铁路以西那片地方。二钢主要是炼铁，到1960年拥有5座13立方米的小高炉（后改造扩大容积）、6座红旗二号炼焦炉，分炼焦、炼铁、机修、破

碎4个车间。两个钢铁厂最兴盛时各有两千多名职工，按设计能力，两个厂一天大约能生产一百七八十吨生铁。一钢、二钢、九里山采矿厂都铺设了铁路专用线。

新乡市大炼钢铁，从人人动手炼废铁、炒钢，到开矿建厂炼铁，从小土炉到小高炉，最后建了两个钢厂，从不正规到比较正规，到1959年初步形成规模，出了铁、钢、材。这在当时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是一个长志气、鼓干劲的事。旧社会资本家曾在新乡办过一个冶铁公司，维持了3个月就破产关闭了，只留下一根烟囱。在社会主义新中国，人民焕发了建设社会主义、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高昂热情，终于改写了新乡手无寸铁的历史。

一钢、二钢虽说具备了小型钢铁企业的规模，但是由于缺乏高品位矿石、高质量焦炭，冶炼技术水平低，因此生产出来的铁、钢、钢材产量低，质量差，成本高。随着国民经济困难，钢铁生产也越来越困难，曾经开展过保粮保钢运动，反映出钢铁生产的困难情况。到1961年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地方小钢厂首当其冲，成了调整对象，豫北我记得只保留了安阳、济源两个钢厂。新乡的两个钢厂在这期间逐渐收缩、精简、下马，从农村招的工人原则上回农村，这部分大约占工厂人数的百分之八十。到1963年一钢、二钢就完全撤销了。

二钢曾经很有名气，荣获过冶金部授予的奖旗，出席过全国工业群英会，是河南乃至全国地方钢铁工业的一面红旗，在一段时间内，报纸大量报道，宣传二钢，每天都有国内外代表团去二钢观摩取经。它有那么个由土到洋的正规钢铁企业的形象，高炉、烟囱林立，铁水奔流，你不承认不行。而且，我市钢铁战线的职工，特别是二钢的干部职工，确实发扬了艰苦创业的精神，苦干实干，搞技术革新，大胆

试验、探索，搞红旗竞赛，人与人，炉与炉，组与组互相挑战、竞赛，你追我赶，热气腾腾。二钢创造的大风、高温、精料、重负荷的冶炼方法，曾作为小高炉优质高产经验在全省全国推广。应该说，二钢的成绩是干出来的。但是也不排除生产数字不实，有虚假的成分，特别是荣誉多了以后，压力大了，背上了包袱，一心想保持红旗不倒，加上上级领导、主管部门下达的任务、指标偏高，二钢终于没有免掉大跃进时期虚报浮夸的毛病。

二钢虚报产量、质量，造假化验单、原始记录等等，大概有半年多时间。1960年春天，二钢弄虚作假的事情暴露，市委十分重视，派工作组调查处理，在厂里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弄虚作假的整风运动，厂党委书记董本祥被撤销职务，有关当事人受到党内处分。市委调宣传部长王耀寰、工业部副部长李文生等同志，分别担任该厂党委书记、副书记、厂长、车间主任，加强领导，转变作风，纠正错误，迅速恢复正常生产。

大跃进时期不断批右倾保守，用思想跃进促生产跃进，人们惟恐落后，戴上右倾帽子，这种心理状态是浮夸风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次我和罗毅书记参加省工业会议，两个人又写又抄，熬了一夜，指导思想是新乡市工业指标不能落到其他地市后面。第二天在大会上发言，受到表扬。开封地委书记张申认为做不到的事情不能说，结果他的发言被指责为右倾，受到批判。那时的气氛就是这样，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数字越报越大，越大越保险，越受表扬，否则就批你右倾保守思想，一钢厂长凌继存就被打成右倾。

大办钢铁付出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收回多少呢？小土群阶段，发动全民动手，一哄而上，不是炼不出铁，就是炼一些无法使用的烧结铁。农村大量劳力上山炼铁，对1958年的秋收、秋种影响很大。就是到了两个钢厂阶段，小土炉变成小高炉，从炼烧结铁到炼流水铁，

生产比较正规，但是由于原料、技术水平和规模的限制，它的投入、产出也是不成比例的，按成本核算是划不来的，当时的说法是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下马以后，厂房、设备的损失也很大，更严重的是，以钢为纲，钢铁元帅升帐，各行各业支援大办钢铁，破坏了工农业之间以及工业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比例失调，造成了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

加速我国工业发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愿望是好的，为什么反而造成失误？根本的一条是头脑发热，不实事求是，违背客观规律。大办钢铁这段历史告诉人们，办任何事情，都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说大话，不说空话，做老实人，办老实事。否则，就要受历史的惩罚。大跃进中我市前前后后搞了5年钢铁工业，建成两个钢厂，最后被关停撤销，经济损失严重。

大办钢铁，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应该同广大干部、群众苦干实干，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区分开来。广大职工的冲天干劲，不怕苦，不怕累，不计报酬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应予肯定，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仍然需要发扬光大。当年搞钢铁工业，一缺乏工程技术人员，二无成套冶炼设备，三没有经验，不仅没干过，而且没见过。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批党的好干部、好职工勇敢实践，大胆探索，坚持“不会就学，边干边学，干中提高”，积极在实践中学习、钻研，逐渐变外行为内行，掌握了各方面的技术和管理方法，成为我市工业战线上的骨干。其中的典型代表是：二钢厂长牛金福、副厂长曹作祥、党委书记董本祥，一钢厂党委书记王东海、厂长凌继存等。他们为我市的钢铁工业出过大力，流过大汗，他们都是实干家、土专家，市委、市政府曾授予牛金福、曹作祥等人工程师职称，牛金福还出国考察过钢铁企业。这些成绩、荣誉是他们脚踏实地干出来的，是党培养、教育的结果，是应该珍惜的。

抗日英雄 郜国武

□ 刘春龙

郜国武是新乡城外大里村人，从小智勇过人。在党的引导教育下，他 15 岁就参加了革命，经常深入敌巢打击敌人，逐渐成长为一名颇有传奇色彩的抗日英雄。

巧端鬼子留守处

1941 年 4 月，由于党内出了叛徒，新、辉、获、汲一带的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鬼子以为消除了后顾之忧，便全力进攻我太行抗口根据地。在此情况下，隐蔽下来的新乡县大里村党支部决定派郜国武潜入城内，配合武装力量，端掉鬼子留守处，牵制日军主力。

鬼子留守处位于老同和裕蛋厂内，前门临大街，后门临卫河南沿。里面有日军的留守及后勤人员，还有一些日军家属，共 50 余人。留守处的敌人虽没有战斗力，但高大结实的围墙上架着电网，几只大狼狗在院内乱窜，周围又有伪军和警察守卫，所以只能计取，不能强攻。

5 月的一个清晨，郜国武化装成赶集的农民来到城里。看着街上三五成群的鬼子、汉奸漫不经心地游荡，他心里暗骂：“兔孙们撒欢哩，

咱走着瞧吧。”不多时，他来到姜庄街董虎家里。董虎是条黑大汉，30 多岁，是日留守处的苦力头头，他正在家等着领郜国武这个“新苦力”去干活。

郜国武混进留守处后，脏活累活抢着干，见了董虎喊老大，见了鬼子就鞠躬。没几天，鬼子看郜国武老实、义气、肯干，便夸这个敦实憨厚的小青年是“大大的良民”。而工友们看他一副奴才相，都暗骂他是东洋狗。

郜国武默默忍受着屈辱。他本来并不认识董虎，只是为了打入留守处才有意结识他。董虎见郜国武聪明勤快，便以大哥自居，称郜为义弟。义兄义弟交杯换盏之际，郜国武发现董虎对日本鬼子也有怨愤，只是为了养活家中老母亲才屈意欢颜。看准了火候，郜国武说：“大哥，我是八路军，为端留守处而来，希望你协助。”董虎先是一愣，继而犹豫地说：“别的不怕，就怕连累老母亲。”

郜国武说：“我与大哥情同手足，大娘如同我母，我们一定保护好她老人家。”一番话打消了董虎的顾虑。

天随人愿。一天晚上，下起了雷阵雨，鬼

子让董虎留下打更，自己早早睡去。午夜，董虎在北小门与外边郃国武带的人接上了头，大家正在为进展顺利而庆幸，一只狼狗突然从黑暗里窜出来，扑向郃国武。郃国武低头一蹲，狼狗从他头顶跃过栽倒在地上，战友们怕打草惊蛇，不敢开枪。狼狗再次向郃国武扑来，借着昏暗的灯光，郃国武眼疾手快，一刀捅进狼狗的胸膛，狼狗打了个滚，死在地上。郃国武问：“那几条狗解决掉没有？”董虎说：“都让我毒死了。”

解决掉狼狗，郃国武和董虎根据掌握的情况，率领武工队员，把日本人从屋里一个个掏了出来。这些日本男女吓得直哆嗦，不敢声张。就这样，武工队一枪未发，顺利把敌人押过卫河，踏上归途。而此时，南大门的两个鬼子哨兵还在直挺挺地站着岗呢。

前线鬼子得知老窝被掏后，气急败坏地赶回来，但已是人去室空，无可奈何了。

杀一儆百为民除害

1942年7月的一天，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热气腾腾逼人。

这一天，对于伪军小队长杨二毛和抗日英雄郃国武都是不寻常的。

上午，新乡城西南沈小营的伪军小队长杨二毛如百爪挠心，非常烦恼。城里鬼子宪兵队长山本要杨的老婆进城做客，他当然明白山本打的什么鬼主意。杨二毛自从投靠了山本，当上伪军队长，作恶多端。不但自己欺凌妇女，而且常昧着良心把良家妇女抓来当礼品送给山本。现在，山本玩到他杨二毛头上，他心里能好受？到了晚上，他突然想起邻村有个新媳妇与自己老婆长得很相象，不禁为这个偷梁换柱的计策得意起来。然而他不知道，抗日除奸的枪口正向他逼来。

郃国武化装成伪军军官，带着两个战友匆匆向沈小营奔去，此行就是要除掉杨二毛。

在杨二毛院门口，郃国武对哨兵说：“我们是贺天龙的朋友，有封信要面交你们杨队长。”

杨二毛的手下都知道红枪会头子贺天龙与他们队长是换帖兄弟，加上郃国武他们神气十足，哨兵不敢怠慢，赶忙进去通报。

杨二毛一身便装出来迎客，身后两个凶神恶煞的随从各揣一把盒子枪咄咄逼人。杨二毛问：“三位在哪里发财？”

郃国武一拱手，“鄙人姓贺，承蒙天龙兄的举荐，刚到山本队长手下任侦缉队长，想必你就是杨队长吧，这是天龙兄给你的信。”

杨二毛知道城里原来的侦缉队长两天前被八路军打死了，听说新队长很年轻，正欲进城结识，如今人家登门拜访，不禁喜形于色，连声说：“快请到屋里坐。”

杨二毛的两个狗腿子见状，忙闪出路来。

宾主刚跨进门槛，郃国武闪电般下了杨二毛的枪。那两个狗腿子没来得及反抗，就被打翻在地上了西天。

不一会儿，郃国武三人簇拥着杨二毛向村外走去。村口的哨兵讨好地问：“队长，进城啊？”杨二毛看了郃国武一眼，身不由己地说：“进城。”其实他心里真不知道这三个冤家要把他弄往哪里。不过他想，只要这三人不是共产党，就不太要紧。

出了村，郃国武厉声问：“杨二毛，你知道我们今天来向你要求什么？”

杨二毛低眉顺眼地说：“要钱、要枪、要女人，我听你们的。”

郃国武冷笑一声，“今天我们只要你的狗命，我们是共产党！”

杨二毛两腿发软，瘫坐在地上。郃国武抽出手枪，结束了杨二毛的狗命。

没几天，城外的汉奸都知道杨二毛被八路军收拾了，纷纷夹起尾巴往城里钻，生怕落个杨二毛的下场。

论辉县抗日战争中

人民群众之力量



□ 张宇

20世纪30年代，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经历了一场惨烈而悲壮的浩劫。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八年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最终取得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民族解放战争史上第一次完全的胜利，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广泛、最深入的全民族总动员。在这段时间中，辉县的爱国将领和爱国军队都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抗击，辉县的人民群众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动，野战军、独立营、武工队、民兵、自卫队抬担架、运军粮、妇救会缝军衣、做军鞋、护理伤员等等，通过各种形式倾其所能地支援抗日战争，使这场战争最终实现了彻底胜利。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全国性抗日战争从此爆发。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将士虽有决心有信心有实力抗击日本侵略军，但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也只能放弃抵抗，侵华日军在几乎毫无阻力的情况下，沿平汉铁路长驱直入南下侵犯豫北。1938年2月8日，日军沿平汉铁路南犯安阳；11日，国民党五十三军由汤阴退至辉县，驻扎盘上、杨吕川和县城东北广大地区，军部驻扎三里屯。驻军虽在驻地附近挖有战壕、工事，并荷枪实弹地警惕着来敌，但在14日获悉日军南进，未敢向来犯之敌投放一枪一弹就仓皇逃跑。16日，日军侵占辉县城，辉县城就此沦陷。

日军在踏进辉县的第一天，就制造了“孟坟惨案”，杀死无辜农民16人，强奸妇女几十人。此后的数年中，日军在辉县

制造了“太头”、“小叶沟”、“西大庙”、“大北程村”等六、七起灭绝人性的惨案。在薄壁西大庙后，一次用机枪扫射死无辜农民48人。还曾出动飞机20余架次，在全县上空狂轰乱炸，炸死炸伤群众100多名，炸毁上千间房屋，无数人民背井离乡，无家可归。辉县到处一片狼藉，人民哀声载道，苦不堪言。



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活动

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1938年5月，中共新、辉、获中心县委在新乡县小块村平汉游击支队司令员李毅之家开会。平汉游击支队政治特派员许冠英传达了中共太南特委的指示，决定陈济民任中心县委书记，负责辉县工作；米光华（新乡西花园人）任组织委员，负责获嘉工作；张天性任宣传委员，负责新乡县的工作；常惠民（陈永年）任县委秘书。中心县委改组后，领导成员在配合平汉游击支队活动的同时，大力发展党组织。陈济民和常惠民化妆成群众到日伪占领区西刘店村开展党的工作。在这里他们很快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建立党支部。西刘店党支部的建立，加强了党对农民群众的领导，同时，陈济民和常惠民还到北新庄、金章、高庄、苏村、圪针林、黄水等村庄，秘密开展工作，建立了党支部，为组织和领导抗日的主力军——发动农民参加抗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只有把越来越多的人吸引和组织到革命运动中来，才能将革命一步一步地推向前进，夺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为把日寇消灭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在农村的各个阶层，都建立起抗日组织，让他们在各条战线、各个层面发挥积极性，为抗日工作做贡献。

爱国青年踊跃参军，奔赴抗日前线

1943年7月，中共辉县县委根据地委的决定，组建辉县抗日民主政府。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为解决抗日军人的后顾之忧，对抗日军人家属制订了很多优待办法，保证军人在前方安心抗日。对当下没吃的，村上进行减租减息，退租退息，使军属有饭吃；少地无房的，可以分配房屋、土地；家庭没有劳力的，可以代耕土地；吃水烧柴困难的，村里派工定期送柴送水；过年过节，为军属送礼品、贴对联。政府对军属制订优待办法之后，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更高，一到政府号召青年参军之时，就出现父（母）送子、妻送夫的热潮。各村也给参军的青年及家属设宴送行。1944年3月，辉县、辉嘉县共有1090多名青年，踊跃参加了八路军野战部队、县大队、独立营。1945年1月15日，辉县、辉嘉县、新乡县共有2710余名青年报名，参加了野战军及地方团队，及时为部队补充了兵源，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巾帼不让须眉，为抗日积极提供后方支援

在多数青年男子参军、当民兵、抬担架、送军粮、上前线参战的情况下，妇女们也在后地积极为支援前线抗日做出了重大贡献。

缝军衣、做军鞋。1944年冬天，抗日政府分配给南寨、西平罗两村缝制一千套棉军装的任务，20日内必须完成。在没有机器完全手工的情况下，广大妇女群策群力，连夜加班，终于完成了任务。1945年4月，上级又分配给辉县、辉嘉县做1.8万双军鞋任务。由于当时日军的经济封锁，布匹、颜料十分缺乏，做鞋困难大。新村妇联主席王桂英组织妇女克服困难，用传统方法，上山采橡壳熬成水，把白布煮上几遍，煮成黄色晾干，再从污水池底挖出污泥涂上几遍，就成了上好的皂（黑）布，克服了没有鞋面料的困难。她还发动西王庄、界地等村妇女，开展做鞋竞赛，一月之内，做成2000双军鞋。

运公粮。1945年秋，黄水沟一带的青壮年都参战了，石门店所存的公粮面临被敌人抢掠

的危险，政府想把它转移到石门沟内的回龙村，男劳力紧张，妇女们就担起这一任务。南盘村妇救会主席万兰英组织40多名妇女，负责转移这些粮食。山路崎岖，往返一趟十几里，每次背的粮食都在70斤以上，脚上打了血泡，也无人叫苦。连续七天，终于完成三万斤公粮的转移任务。

护理伤员。1944年秋，腊江口伏击战，战时医院扎在孙石窑、三郊口等村。邻近村的妇救会动员了一部分妇女去护理伤员。开始因受长期封建思想影响，这些妇女在伤员前很是拘束。孙石窑妇女主席申秀英一面以身作则，带头为伤员端汤送药，洗衣服、拆被褥、倒粪便，一面给妇女们讲，伤员们是为保护群众的安宁受伤的，应当将伤员当成亲人，妇女们觉得她说的对，渐渐和伤员们有了阶级感情，热情护理伤员。

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村村建立妇救会。据统计，辉县78个行政村，共有妇救会会员5044人，广大会员在妇救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生产救灾、清算保长贪污、减租减息、送子参军、送夫参军，为支援前线作出了巨大贡献。

全民参战，粉碎敌人的扫荡。

藏粮备战，空室清野。开始人民群众只要一听说日军来扫荡，就牵毛驴、挑被褥、带干粮逃往深山。结果敌人来了，抢走粮食衣物。烧尽桌柜木器、砸碎缸瓮锅碗，损失惨重。抗日政府成立后，发动全员，藏粮备战，空室清野，尽量减少敌人破坏的损失，粉碎敌人的扫荡。政府经常向各村群众通报敌人的动向，组织各村家家户户，打地窖、挖窑洞，把公粮、私粮、衣物、缸瓮、器皿都埋藏起来；柴草运往野外山谷，远离村庄；把水井、水窖封闭起来；教育群众保守秘密，绝不泄露战备情况。

敌人一来，男女老幼，驴驮人挑粮食衣物进山。敌人进村抢不到东西，找不到水源，到处受困，群众损失减少。

站岗放哨，联防抗敌。为掌握敌人动向，做到有备无患，政府把邻近数个行政村组织起来，联合防备，称为联防。在区武装委员会领导下，组成联防民兵、联防自卫队。联防自卫队的首要任务是站岗放哨，准确报告敌情，迅捷传递消息。为作到迅速准确的报告敌情，在沿敌人进犯路线的山头上，如十八盘岭头、南村南岭头、榭树庄山头、西平罗西山头、山怀山头、羊郊山头、北寨山头……等地，竖起“消息树”。每处竖两棵，若见倒下棵，说明敌人已经出动，各村民兵赶紧通知群众准备逃跑；若倒下两棵，说明敌人已不远，村民必须走光。如果消息树竖起一棵告知敌人已开始撤退，群众可以准备回家；竖起两棵，告知敌人已经走光，可以安全回村了。这是抗日根据地人民创造的一种极为可靠的通讯方式。

自立更生发展生产。日军占领辉县城后，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不准把食盐、食糖、煤油、火柴、颜料、棉花、布匹、药品等工业品运往抗日根据地，企图困死抗日军民。抗日政府为粉碎敌人的阴谋，积极领导人民群众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棉布困难，就发动群众广种棉花，每户种一亩左右，整个根据



妇女运粮

地，就有3万余亩、每亩产皮棉40斤，总产即达120万斤，每户织上100尺布，全根据地就是300万尺，除农户留下三分之一自用，余下由商业部门收购，转售给军用，基本解决军需民用。染料缺乏，家家户户采用传统办法，用麦苗、树叶、野草染线染布，或用红土、污泥皂布，照样可以织花布、穿新衣、御寒取暖。没有煤油，用食油代替，没有火柴，群众就用锅底墨、犁铧翅打石取火，取暖做饭，党和政府领导人民，想尽办法，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抗战胜利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关键。

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有一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先进政党。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义以最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首先，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并积极倡导、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其次，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都在积极地组织抗战，将敌后战场上升为主战场，打击了大部分日本侵略者和几乎全部伪军，对抗战的持久作战和最终胜利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再次，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及时总结战争的发展趋势和斗争经验，提出并实施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

以民为本是制胜法宝。

抗战初期，国民党在正面战场顽强抗战，

但因忽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几乎完全依赖抗日军队打阵地战，导致伤亡惨重，后来军阀割据、内部分裂，中国一盘散沙。毛泽东认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战争胜负是国家政治、经济、军事、自然地理和主观指导能力等因素决定的，而这种决定作用归根结底是通过人民群众来体现的。日本是工业国，当时的军力、经济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第一等的，但日本是一个小国，资源匮乏。中国虽然各方面条件不如日本，但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除了在后方向共产党提供物资供给之外，也通过各种方式巧妙的与日军作战，使日军防不胜防。这种强弱优势的相互转变，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是做不到的。

爱国主义是精神支撑。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动力和支柱，而民族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在中国历史上，从岳飞“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到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无不洋溢着凛然正气和赤诚的爱国之心。正是在这种爱国主义的感召之下，面对日军的入侵，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各界爱国人士都义无反顾投身到这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斗争中，形成了全国人民共同抗战的局面，其声势、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中国爱国主义精神的整体性的大发扬，是在敌强我弱形势下抗日战争得以持久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



抗战胜利的历史经验对当今社会的启示

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强大，这是战争留给我们最深痛的教训。

从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这一百多年间，英、法、德、俄、美、日、意等，几乎所有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战争是国家实力的对抗，周总理曾感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对付帝国主义却不能不讲实力。只有在国家总体实力包括军事实力方面赶超世界水平，中华民族才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国经过多年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巨大发展，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高，与抗战时期的综合国力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因此发展仍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加快促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和谐社会建设，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才能让我国永远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坚持群众路线，始终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着力点。

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最广泛的发动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战争才能取得胜利。因此我们必须紧紧依靠群众，这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以众人之力起事者，无不成也”，首先，要正确认识人民群众的地位。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第一创造者，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推动力。其次，要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真正做到重视人民，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重，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要大力宣传抗日战争精神，弘扬民族精神。

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誓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和抗战到底的顽强毅力。在新形势下，我们要认真全面地学习抗日战争的历史史实，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强化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使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不断高涨，以更加强烈的使命感，全身心的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为建设富强民族文明和谐的社会现代化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要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民族精神，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握历史机遇，奋勇向前，为共同实现我们伟大的中国梦而努力。

（该文入选《2015年河南省党史界学术年会论文集》）



政治交通员

郭美

□ 孙建设

郭美，河南省辉县高庄人，1900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早年丧母，历尽贫寒，自幼上山砍柴，割草，挑炭，以维持家计。年长离家，入民间会道门组织“圣人道”，肩披褡裢，云游四乡，劝善传道，人称“郭善人”。

在走乡串巷的传道过程中，郭美接触到共产党的工作人员，贫苦的身世以及对黑暗势力的强烈憎恨，使他很快接受了党的教育。1938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自发反抗人间不平的“郭善人”，成长为自觉的革命战士。

1938年，郭美在八路军豫北工作团（中共新辉获汲中心县委）工作，他以道徒身份奔走各地，搜集敌人情况，访贫问苦，传播抗日火种。次年，八路军道南支队（一二九师韩东山补充团）在辉县扩兵，组织上派郭美协助这项工作。他深入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匹夫有责的道理，动员青年农民数百人参加抗日队伍，完成了扩兵任务。

1939年12月，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太行山以南的共产党组织和军队撤到林县北部，新辉获汲中心县委撤销，成立中共豫北地委。1940年4月，郭美担任豫北地委政治交通员，仍以道徒身份作掩护，往来于新乡、辉县、汲县、

获嘉、林县等地，沟通党的领导机关同隐蔽在敌顽占区的党组织、党员之间的联系。郭美擅长与各色人等打交道，社会经验丰富，应变能力强，虽识字不多，但能将重要文件默记在心，忠实传达。

1942年初，郭美通过佛堂会门的关系进入日军占领的新乡城，在火车站日伪站长汪汉生家里做佣人。其时，汪和中华戏院老板合开了一家冷食店，让郭美照管该店的生意。有了这个合法身份，郭美顺利进出日伪关卡，和根据地党组织保持联系，并逐步开辟新乡城内地下工作。冷食店的厨师王耀先，家庭生活十分困难，郭美时常在经济上予以帮助。8月冷食店关门，郭美便到王耀先家落脚，王假称郭是其表兄，报上户口，领取了“良民证”。郭美又帮助王耀先摆纸烟摊维持生活，不久二人成为结拜兄弟。郭美一步一步启发王耀先的民族、阶级意识，当郭美表明自己的“八路”身份时，王毫不犹豫，表示愿意“上背父母，下背妻子”，跟随郭美做党的地下工作。这样，郭美在日伪统治严密的新乡建立了可靠的隐蔽点，为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

1944年冬，中共新乡城市工作委员会建立，



郭美烈士墓

机关驻辉县西部山区抗日根据地，郭美调任新乡城工委政治交通员。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局部反攻阶段，党对敌占城市的工作方针是：争取群众，瓦解伪军伪警，准备里应外合占领城市与交通要道。为了实现里应外合，新乡城工委认真分析斗争形势，决定派遣干部，从根据地秘密进入新乡，多头多路开展工作。在派遣工作的具体实施上，郭美谨慎周密，灵活巧妙，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从根据地陆续打入新乡的干部，在郭美的周密安排下，很快都有了合法身份，受到人民群众的保护，很好地隐蔽下来，从而使党在新乡的地下组织得到巩固和发展。

郭美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他深知在日伪、国民党统治区活动，一刻也离不开人民的支持。他为人忠厚，乐于助人，每与群众接触，先以道徒面目出现，嘘寒问暖，为其生计出主意，想办法。取得信赖后，逐渐灌输革命道理，启发阶级觉悟，择感情、言谈融洽之时，亮明自己的真实身份。这样同人民群众建立起血肉联系，争取群众的支持和掩护，并培养发展先进分子加入党组织，造成在敌区活动的有利条件。前述王耀先，便是郭美在新乡开展地下活动的得力助手。李春泰、刘玉德等人也是郭美引导走上革命道路的。

郭美多次组织城内地下工作者在各种场合散发宣传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人民军队在各个战场的胜利，揭露敌人的罪行和阴谋，唤起群众觉醒。1942年9月的一天，郭美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之后，郑重问李春泰：“你愿意为八路军工作吗？”李作了肯定的回答。郭美当即交给他6份太行军区出版的《战斗》杂志，让他在工厂里散发，叮嘱他大胆、沉着、谨慎。这次行动，鼓舞了工人群众抗战胜利的信心，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1944

年，郭美又将两本日本反战同盟成员写的小册子带给李春泰，李乘办公室无人之机，将小册子放进两名日本技师的抽屉里，造成敌人内部恐慌。

郭美机智勇敢，胆大心细，每次行动，他预先调查地形，精心策划每一环节，保证在敌人戒备森严的情况下，顺利完成任务。1946年初，国民党蓄意制造军事冲突，阴谋进攻解放区，内战形势一触即发。一天，郭美得知国民党在中华戏院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破坏会场。他和王耀先一起来到中华戏院，王耀先利用情况熟悉之便混进去，戏院里面已经坐了不少国民党军官。他仔细观察，乘敌人不备，迅速把一捆宣传品放在纠察桌上，又分别在左右两排观众席上各放了一捆，然后悄悄地走进了舞台后面的演员化妆室。敌军官陆续进场，发现传单后，顿时炸了窝，乱成一团。敌军警宪兵开始搜查。乘此机会，王耀先从后门溜出，郭守在那里接应，两人安全撤离。敌人召开的军事会议被冲乱了，戏也没演成，夜间在新乡城里大肆清查户口，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拂晓。而郭美和王耀先早已安全地隐蔽起来了。

搜集、传递情报是敌区地下工作一项重要内容。郭美紧紧依靠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利用广泛复杂的社会关系，多层次多渠道搜集敌人

情报，及时送往根据地领导机关。张凤彬顶替王耀先的名字到机务段后，郭美要王耀先改名王东明，在火车站附近开设一家茶馆，名“明星茶社”。郭美对王耀先说：“过河需搭桥，茶社就是我们的一个桥梁。”他们利用这个桥梁，与国民党下层军官拉关系，交“朋友”，了解敌情。1946年农历中秋，两个国民党军官到茶社闲坐，郭美与之拉家常，套近乎，又吆喝掌柜上酒上菜。郭美频频劝酒，两个军官渐渐失去戒备，醉意朦胧中，将其所知城内军事部署，官佐姓名等情况供了出来。地下工作者经常乘敌拉伏修工事的机会，以泥瓦工、木工身份混入敌防区，了解敌人兵力、火力、工事情况，有时还绘制简易地图，报告给城工委机关。

有段时间，一个国民党排长常去茶社，郭美见他愁眉苦脸，情绪消沉，就主动与他攀谈。原来该排长想回家侍奉老母，苦于无计逃离。郭美便为他想办法，王耀先带着排长的行李先上火车，排长徒手尾随其后，火车快开时王耀先再下车。该排长就这样逃离了国民党军队。类似策反敌下层官兵，鼓励和帮助他们开小差逃走的事情还有几次，有效地瓦解了敌军。

战争年代根据地物资匮乏，枪弹、药品、纸张、油墨、布匹、煤油等尤为急需。由于敌人的封锁，这些物品筹集不易，通过敌人关卡

运到根据地更加困难。对此，郭美动了不少脑筋。他组织人员以跑生意为名夹带禁运品，将平板车改制成双层，底层暗藏禁运品，面上用一般货物应付敌人检查。郭美还在明星茶社等场合与敌兵结交“酒肉朋友”，这些“朋友”在封锁线站哨时，货物不用检查就放行了。有时地下工作者装扮成满身污垢的疯子，弹药纸张裹在破破烂烂的衣服里面混出去。郭美就是这样想方设法筹运一批批物资，缓解了根据地燃眉之急。

郭美是一位出色的地下政治交通员，他对党忠诚，意志坚定，大胆谨慎，有勇有谋。在白色恐怖下的敌占城市新乡，他依靠党组织，依靠人民群众，灵活运用斗争策略，建立各种关系，采取多种形式，宣传群众，瓦解敌人，保护同志，搜集情报，筹运物资，做了大量切切实实的工作。正当他为人民解放事业不避艰险，辛苦奔波的时候，不幸的事件发生了。

1946年12月15日，郭美携带活动经费从根据地返新乡，途经辉县北陈马村，被国民党地方武装逮捕，惨遭杀害。时年郭美46岁。

郭美牺牲后，新乡城工委派人连夜运回遗体，沉痛追悼，埋葬于黄水村。1951年12月，中共辉县县委将郭美灵柩迁葬他的故乡高庄，为烈士立碑铭文，永志纪念。

郭美算卦

1942年春天，久旱干裂的辉县山野，草不泛绿，麦不返青，到处一片枯黄。灾民纷纷外出逃荒。

一天中午，一位肩背褡裢、手拿木盒的人，来到辉北偏僻山村杨和寺。他在一棵槐树旁坐下，边摇木盒边叫：“算卦啦，算卦啦……”不一会儿，就有很多人围了上来。

大家七嘴八舌问着逃荒的事情，有人打算南下徐州，只听这位算命先生说：“错了，错了！往南往南，越往南越难。逃荒在外，不如在家吃糠咽菜。即便要走，只能往北，千万不能往南；北有太行山，山中有救苦救难的亲人。”他看看大家听得很起劲，又往下讲，“亲人

很快就会到来，大家最好不外逃，安心种地，搞好春耕，一定能战胜灾荒，渡过难关……”

他的话说到了群众心坎上，听的人越聚越多，没人要他算卦，都在静心听他津津有味的演讲。时候不早了，他起身和大家告辞，说以后再回来。

没隔几天，此人又出现在杨和寺村，还给穷苦人带了些粮食和钱。他来的次数多了，灾民和他日益亲热起来，他象磁石一样吸引住了群众。逃荒的人越来越少，个别出去的也不南往日伪统治区。

这位算卦先生就是郭美，当时担任中共豫北地委政治交通员。他的任务是宣传抗日，组织武装，发动群众生产自救。



怎样做一名合格的党史工作者

□ 孙建设

孙建设同志原任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长期从事党史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工作体会，在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孙建设同志应邀以做好本职工作为题，为全室同志上了一堂党课，现将讲稿略作整理，予以刊登。

借“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上党课的机会，我结合自己在党史部门多年的工作体会，与大家交流一下怎样做一名合格的党史工作者。

态 度

我主要围绕态度和素质两个方面展开，其中态度是首要的。我曾经看过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写的短篇小说《品质》，这篇小说给我印

象深刻。书中讲到有两兄弟开了一个修鞋铺，专门订做皮鞋，他们非常仔细，工作兢兢业业，非常享受自己精湛的手艺。他们做出的鞋子“只有亲眼看过靴子灵魂的人才能做出来”，他们把靴子的本质都缝了进去。机器化时代的来临，使得手工作业逐渐衰退，两人不肯偷工减料，不肯降低标准，最终被饿死。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一件事情投入自己全部的心血、感情、心智，这就是敬业的品质。

党史工作，首先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业、我们的本分。用比较低的标准要求，是把这份工作当成一种职业，那你需要对得起自己的职业、工资，这是最低的要求。

如果说个人志趣与所从事的工作契合，这是最好的一种境界。你所喜爱的刚好是自己的工作，那就可以当成事业来做。这是最高的境界。我个人还不敢说达到这个境界，但是我们单位的一位老同志——傅维江，他是达到这个境界了。傅维江同志工科出身，上了七年夜大拿到文凭，但是喜欢文史，四十多岁从贵州调到新乡党史办工作，兢兢业业，踏踏实实，获得中央党史研究室表彰的“全国优秀党史工作者”。新乡党史研究室成立三十多年以来，只有两人获得此荣誉。古语讲到“明其道不计其功”，做事情时只需追求真理，不考虑功利，这是我们的处事之要。不论把党史工作当成职业还是事业，都要尽职尽责做好，明确责任使命，踏踏实实、心无旁骛的做好这份工作。

从当职业做到追求事业，恰如先结婚后恋爱，慢慢接触工作，在实践中学习提高，渐入佳境，爱上这份工作，完成从职业到事业的转换。

从事党史工作是要坐得住冷板凳的，比起那些“热”部门，艰苦、辛苦、清苦，为什么还要喜欢呢？

从宏观来说，党史工作很重要。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引用了清代学者的一句话“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这说明党史工作的重要性。从苏联垮台的教训里确实也能看出来。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重新评价历史和苏共党史人物，从列宁、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都被重新评价，扰乱了人们的思想。作为执政党，否定自己的历史，就是否定自己执政的合法性。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这从两个《决议》，特别是1981年形成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能看出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思潮——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这一思潮也是通过

共产党的失误，通过建国以来我们搞的一些欲速不达的事情——政治上的“左倾”，经济上的“左倾”过热，来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邓小平为此主持召开会议，花费很大的精力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党史工作是一种文化积累，我们记载历史，历史记载我们。历朝历代都要有人修史，我们有幸来编写党的历史，做文化积累、传承历史的任务。我们平时都是默默无闻、辛勤耕耘，我们不创造历史，但是我们记载历史，把创造历史的人和事记载下来，也把我们的名字留在了历史上，所以我们的工作有苦也有甘。新乡解放五十周年的时候，烈士陵园主动找到我们让我们写碑文，我们就是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从个人工作来说，我曾经撰写的张公干自述、许福卿口述史，根据他们个人自述，结合时代背景，写出了得到本人认可的文章。这些文章社会反响很好。我也从中获得了成就感。

大家都应该有从职业到事业的追求，热爱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岗位多出成绩、多做成就。我们那个年代是国家分配工作的，自己不能挑选。现在不一样了，大家都有职业规划，都追求实现自身价值。对于新入职的同事来说，工作是自己选择的，说明你认为这个工作比较适合你，你也比较喜欢，所以更没有理由不做好自己的工作。这和当前党中央号召的“三严三实”——严以修身、严以律己、严以用权也是联系在一起的。

正确的态度是热爱党史工作，尽职尽责，尽心尽力。不能停留在做好领导分配做的工作上，要用心去做，积极主动，用心思考，真正钻研进去，探索新形势下做好党史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拓展党史工作的空间和领域。例如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很多单位主动找到我们，要求配合制作节目、拍摄专题片，这是宣传党史的好途径。历史书本的宣传教育范围

是有限的，经过电视台宣传，受众更多。所以新形势下我们需要主动思考，探索更多方法、途径。

素质

作为一名党史工作者，应该具备的素质有：

政治素质 党史姓党，这是党史工作的根本原则。党史工作政治性非常强，也有学术性，但是政治性是首要的。我们经常说，要把党性和科学性有机结合，很多时候它们也是一致的。党性也讲实事求是，历史研究也要有科学的理论做指导，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指导。

党性还要求我们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政治上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与两个《决议》保持一致。对于党史大事，要积累好资料，但是公开发表要审慎，不利于安定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不去做。随着时间推移，一些敏感问题可以研究，以便吸取教训，但公布时间还要慎重。邓小平八十年代讲党史工作宜粗不宜细，因为有些问题不方便展开。这也是相对概念，现在，我们对八十年代的很多问题就可以展开来研究。此外，政治素质要求还有很多，如政治学习等。作为一名党史工作者，政治敏感性和责任意识是必须具备的。

业务素质 古人讲的修史之士要具备四长：史德、史学、史识、史才。

史德。修史之人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高度敬畏历史，追求真实的历史，以最大程度的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就要求个人不偏私，不能因为个人好恶改写历史，要有严谨的学风。清代考据学讲究“不可无一字无出处”，从收集资料到编写，我们都要确保资料准确可靠。在此基础上，表述要准确。现代资讯很发达，有些同志为求方便快捷，上网搜的资料或者道听途说的，拿来就用，这都是孤证，不能偏信盲从。尤其是我们部门，作为研究新乡党史的

最权威部门，遇到问题，首先要从自己的材料中去找线索，网上搜索的或者别的媒体涉及到的资料可以作为线索，以待考证，但不能偏信，不可盲从，必须有严谨的学风。举个例子，就是关于新乡城工委成立的时间问题。老版党史一卷还是记载着新乡城工委成立于1943年11月，这个时间是从新乡城工委副书记米光华的档案履历里摘出。他是亲历者，是当事人，自建国后干部档案建立起，其每份履历都是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应该很可靠的。我在写米光华传记时，经过搜集资料发现1944年6月米光华还担任修武县委书记，并且带部队打仗负伤。这两个时间冲突，难道是交叉任职？修武县委属于太行八地委，城工委属于七地委，就如同今天的新乡和安阳，不能交叉任职。发现此矛盾，没来得及考证，后来编写《中共新乡城工委》这本书时，决定不能将此问题流传下去。当时我们到山西档案馆查阅资料，到北京找老同志，到安阳、鹤壁、省档案馆，通过比对、鉴别，确定新乡城工委成立时间为1944年冬天。在外人看来不必费劲，但是作为党史工作者必须有严谨的学风，发现问题一定要搞清楚，搞不清楚也要标注两说并立。

史学。即历史知识。我们做党史的要熟知党史，要积累大量历史知识，了解党史发展脉络、党史大事件、大人物。做地方党史对全国党史、世界历史都要有概念，这是一个长期积淀的过程。我们要了解大事件、大人物，这样才能知道他们在新乡历史上的重要性。如朱瑞，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和邓小平、左权、杨尚昆是同学，在红军年代就是三军团政治部主任。1937年9月到1938年2月在新乡仅六个月的时间，朱瑞就做了很多工作。所以在写他的传记时，了解他的地位，突出并全面、详实地记录他在新乡的活动，这反过来也有助于我们研究地方历史。参观革命圣地、纪念馆，我们也要有这种党史意识，平时要用心，通过各种渠道，如看人物传记、历史小说、影视作品，积

累历史知识，丰富党史知识，从不同角度学习，在实践中学习。即使遇到问题，也知道从何处查找资料。

史识。史识就是对历史的观点、认识、评价，这是很重要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繁琐杂乱，没有理论功底，难以理出头绪、分清主次。能不能正确合理的取舍和运用历史资料，就看有没有理论功底。历史不是资料的堆积，也不要要求大段大段评价，评价是画龙点睛，但是资料的取舍上完全可以看出个人观点。理论功底深厚，研究新乡历史就会信手拈来。

看大党史，学习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就可以更好地把握地方党史。华新纱厂建党是新乡最早，这与中国共产党成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这一理论是契合的。早在华新纱厂建党前，上级就派人到工人中宣传、办夜校，组织工人罢工，提出政治经济要求，把工人发动起来。再如新乡根据地都处在县与县交界处，辉嘉、修获武、延浚汲淇、滨河等，都可以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得到解释，其中关于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原因、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的优越条件，地方党史与全国党史都是一致的。这就是史识的重要性，用正确的理论指导我们工作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对农村生产关系变革没有概念，对2005年、2006年党中央将新农村建设提到战略高度就不会深刻理解。当时提出这个战略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发展到这个阶段了，以前我们是通过剪刀差（农产品价格低，工业品价格高）积累资金，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这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人民公社化、大跃进都是把农村财力集中起来发展重工业，现在我们的经济条件允许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所以对“三农”问题实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废除农业税。搞清楚事情来龙去脉，就可以准确把握历史。再如经济体制改革，对过去长期形成的计划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也是有过程的。开始是搞活放权，扩大

企业自主权，这是一个阶段，到了21世纪，提出产权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些涉及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学理论，了解这些理论，对于我们判断、评价历史事件都是有利的，便于我们理清头绪，突出重点。

4. 史才。即修史的才能。这首先体现在我们搜集、鉴别党史的功夫上，从哪里入手，有哪些渠道，都要看个人的“史才”。一般有两大渠道：活资料，如回忆、口述；文献资料，如档案资料、书信等。我们去采访老同志也要做足功课，了解他们的经历、做过的事、认识的人等，还要思考问哪些问题，如何引导等。

作为党史工作者，我们还要对各类文章体裁运用自如。大事记、专题、人物传、回忆录、考证性文章、学术性文章，都有不同的要求。党史人物传不能过多渲染、演绎想象，平铺直叙，恰当评价即可；史稿要朴实简洁，历史与逻辑一致，明白通畅；大事记起索引作用，三两句即可，需要展开的稍稍展开。在此推荐大家看一下胡绳写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其中的语言、逻辑都是值得学习借鉴的。我当初写的考证城工委成立时间的文章，为了力求准确，查阅了大量资料，反复论证，最终修正了成立时间，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在文字叙述上，要准确、平实、简洁，实实在在，不掺杂水分。历史文章要剔除大话空话。大跃进时期形成的档案资料，当时也是言之凿凿的，现在看数字都是有水分的，所以在研究历史时要鉴别，叙述时要剔除水分。文字表述是我们的看家本领，希望大家多下功夫，各种题材多写多练，尤其要多写，这样才会提高。即使是个人心得体会，也要思路清晰，逻辑连贯，文气贯通，不要复制粘贴，要扎扎实实练好基本功。“文章千古事，当官一时荣”，这既是一种鼓励，同时更是告诫我们写文章一定要审慎。



2015年7月份

新乡市委召开常委会议 7月3日，市委书记舒庆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学习省委九届十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研究新乡市贯彻落实意见。舒庆强调，一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任务，真正使从严治党各项措施落到实处。二要深入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高标准组织专题学习研讨，对“不严不实”的问题进行专项整治。三要深化“三查三保”活动，发挥区位、科技、南太行资源“三大优势”，实施产业强市、科技兴市、环境立市“三大战略”，强力推进“两大一高”（重大项目建设、重大工作专项和高成长区域）战略振兴工程，长短结合，统筹推进，努力在全省发展大局中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河南日报》《“四个全面”大家谈》栏目走进新乡市 7月14日，《河南日报》《“四个全面”大家谈》栏目走进新乡市，围绕“适应新常态、借势谋发展”这一主题，以访谈形

式对新乡市的战略谋划、发展思路、工作举措等进行深入采访和挖掘。市委书记舒庆参加访谈，表示要借势航空港、共建大都市、承担大功能、形成大合力，争取在全省发展大局中“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新乡现代公铁物流园货运专线正式运营 7月22日，新乡现代公铁物流园满载货物的火车即将出发。作为中原地区唯一拥有3条铁路货运专线与火车货站的物流园区，新乡现代公铁物流园货运专线与火车货站于2014年12月21日正式开通，经过半年多的试运营，已顺利过渡到正式运营阶段。

张喜忠入选河南省优秀复转军人年度“十大新闻人物” 7月27日，全省第五届优秀复转军人年度“十大新闻人物”评选活动揭晓，新乡籍在外务工人员优秀代表、北京首家老兵保洁服务中心经理张喜忠入选。省领导、省军区首长分别为张喜忠等“十大新闻人物”颁奖。新乡市委副书记安伟，市委常委、新乡军分区政委陈祖刚出席颁奖晚会。

2015年8月份

河南省首只地市级新型城镇化发展基金在新乡设立 8月11日,由新乡投资集团与惠银东方(北京)投资管理公司联合设立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基金举行正式签约仪式。据悉,该基金是河南省设立的第一只地市级新型城镇化发展基金,也是目前国内参与金融机构最多的一只基金。该基金的设立将有效缓解新乡市城市发展资金瓶颈问题,不仅有效缓解中小型企业融资难等问题,还可以实现资金供需双方信息的及时沟通,搭建各家银行对金融政策、融资策略的交流研讨平台,促进形成当地银企合作的良好氛围。

舒庆带队赴周口市商丘市学习考察 8月13日至14日,新乡市委书记舒庆带领各县(市)、区委,平原示范区、高新区、经开区及部分市直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考察团,赴周口市、商丘市学习考察产业集聚区建设、产业集群培育、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做法。考察团先后到周口市城区及太康县,商丘市柘城县、睢县、民权县进行考察。

全省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推进会在新乡市召开 8月27日,全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推进会在新乡市召开。就如何做好全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副省长王铁提出5点要求:一是要在学习经验上下真功夫。二是要在查摆问题上真功夫。三是要在吃透原则上真功夫。四是要在夯实责任上下真功夫。五是要在指导督察上下真功夫。

2015年9月份

国家农改试验区工作交流会在新乡召开 9月1日,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专题座谈交流会在新乡召开,新

乡、朔州、苏州等12个试验区作经验交流发言,介绍各自的试验做法和成果。新乡市是河南省唯一的试验区,也是全国4个承担农村综合改革试验课题试验区之一,具体承担“城乡一体化制度建设”试验项目。

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党性教育基地在新乡挂牌 9月20日,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党性教育基地挂牌仪式在新乡市委党校举行。中央党校副校长徐伟新和新乡市委书记舒庆共同为基地揭牌。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赵振华在挂牌仪式上说,党中央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培养,开展党性教育除了讲授基本理论之外,还需进行体验式和现场教学,以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之所以选择新乡市委党校作为党性教育基地,主要是因为新乡的全国劳模和先进典型比较集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代先后涌现出的新乡先进群体,带领群众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充分显示了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

2015年10月份

新乡市企业家李江福当选全国道德模范 10月13日,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结果在北京揭晓,新乡市企业家——河南新城建设有限公司项目部经理李江福当选诚实守信模范。多年来,他坚持靠诚信建造了1000多栋楼房,没有出过一次质量问题、没有一次延误工期,他把诚信铺在前行的路上,越走越远。

新乡市成功入选“宽带中国”示范城市 10月19日,工信部与国家发改委联合公布了2015年度“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城市群)名单,新乡市名列其中。至此,新乡成为继郑州、洛阳之后河南省第三个人选“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城市群)的城市。